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丘為君博士

金毓黻史學研究與史學思想：

以《東北通史》與《中國史學史》為例

研究生：范綱壇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六月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問題意識	1
第二節：研究回顧	4
第三節：研究討論與行文安排	13
第一章 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形成	16
第一節：金毓黻之生平簡述	16
第二節：治學路徑與知識養料	18
第三節：金毓黻對當代學術的回應	22
第四節：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形成	27
第二章 金毓黻之東北史研究	30
第一節：中國近代東北史研究的發展	30
第二節：金毓黻早年的東北史研究	33
第三節：《東北通史》一書內容與結構	36
第四節：金毓黻之東北史研究與《東北通史》的成就	39
第五節：小結	43
第三章 金毓黻之史學史研究	45
第一節：中國史學史的傳統與近代學科的成立	45
第二節：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之編寫過程	49
第三節：《中國史學史》一書內容與結構	53

第四節：《中國史學史》所呈現金毓黻史學研究之特色	57
第五節：小結	60
結論 金毓黻史學思想之特色	62
第一節：金毓黻史學思想的「調和性」	62
第二節：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基礎性」	64
第三節：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關係	66
徵引與參考書目	68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可上溯自 1900 年以降，由梁啟超等人面對西力東漸，為求中國的富強以及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進而著手梳理中國的學術傳統。梁氏所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可謂中國最初的「近代學術史研究」，這一帶有文化反省與批判的學術取徑，自 1920 年代「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後依舊蓬勃發展，如錢穆、柳詒徵、楊東莼等人，也在這一脈絡下開展其近代學術史研究。¹二戰後，學界對於近代學術史的討論，進入到思想史層面的理解，以討論民國重要思想家，如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學術思想為主，可以說縮小了過去宏觀式的脈絡整理，而集中於個人思想特殊性的討論。²1980 年代後，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在學界也受到一定的重視，可以說延續了民國以來對中國學術討論的傳統。對於近代，尤其自晚清到民國以降的學術發展，最初的研究路徑有二，其一為傳統的學人研究，以晚清至民初的重要學人為研究主題，討論其學術成果、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想變化等；其二為學風與學派的研究取向，如晚清以來經學、新史學派、古史辨學派、唯物史觀學派等。³

上述研究總觀來說有一個共通點，即多著重於現象的描述與整理。誠然，這樣的研究成果，對於理解近代學人與近代學術的發展過程，有一定的基礎貢獻。而清末民初的中國，呈現了激烈的社會變革，尤其 1895 至 1925 年間，可謂中國在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的轉型階段，在這樣的時代動盪下，對學術發展有一定的影響。⁴而在這樣的出發點下，對於近代學術史的研究上，便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角度。

第一項取徑，是討論在文化與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學術如何走向現代學術體制，這些「推動者」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定位，諸如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一派

¹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頁 1-2。

²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頁 2。

³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頁 2-4。

⁴ 「轉型時期」一詞由張灝提出，以此命名的原因為：在文化上，因新式報刊、新式學堂，加上新式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的大量出現，推動了新知識與新思想的傳播。另外戊戌維新運動帶來新辦書院與學堂的風氣，設立新學科，介紹新思想，引起教育制度大規模的改變。詳細論述可參見氏作〈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自《時代的探索》（台北：聯經出版，2004），頁 38-42。

學人的討論，這一取徑可說是現今主流的研究方向。大體來說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從思想的變遷著手，帶有孔恩「典範轉移」的意味，如前文所述的學術流派研究外，尚有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⁵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⁶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等著作，⁷從近代中國學術所討論的議題與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探討學術的轉型與變化。第二則是考察學術制度建立的過程，也是近年對於學術轉型研究的重心，這類的研究在補強學術轉型中「外在結構」研究的不足之處，討論的取向如以下研究，如劉龍心《學術與制度》⁸以及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⁹此二書以近代「學術制度框架的形成」作為轉型的重點；另外如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¹⁰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等作品，¹¹則討論「近代新興成立的各項學術組織」在近代學術研究方面的貢獻。而做為學術組織的一環，晚清以來成立的各種新式學堂過渡到近代意義的「大學」，也屬於這類討論的範疇，如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¹²與《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二專書，¹³介紹南京大學的前身「三江師範學堂」(後改為兩江師範學堂)，以及清華大學的演進過程。而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一書，則對於以上所說近代學術轉化中所設立的各項結構，有綜合性的介紹。¹⁴

第二項取徑，則是站在近於「迴護」的立場，討論在時代劇變下，對於傳統價值嚴守陣線的「防禦者」，他們所堅持的信念以及原因，這方面的研究要以《學衡》雜誌一派的學人為中心。如沈衛威《回眸學衡派》，¹⁵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¹⁶以及諸多學者對於吳宓、梅光迪、胡先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等人的個案研究，作為中國轉型階段討論的另一條軸線。

⁵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2006。

⁶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台北：麥田出版，2000。

⁷ 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9。

⁸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北：遠流出版，2002。

⁹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2004。

¹⁰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國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出版，2000。

¹¹ 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七—一九四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頁1-50。

¹² 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 1903-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¹³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¹⁴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¹⁵ 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台北：立緒出版，2000。

¹⁶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1984。

誠然，以上取徑所塑造的破舊立新或維繫傳統，究其當時學人的出發點，都是爲了提升中國在近代世界的競爭力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再造、再認識。然而，筆者發現還有第三項取徑，在轉型時期的學術發展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他們並非學術發展的「推動者」，也非維繫傳統的「防禦者」，而是在「傳統」與「新潮」的價值觀當中，試圖取得平衡的「調和者」。

作爲學術圈的調和者，粗略來說，這類學人並非全面贊同西方文化，但也未必全面否定中國傳統，顯著的一個例子是嚴復。就黃克武的研究，嚴復通曉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的精神，但是在提出現實世界的改造時，嚴復加入了傳統儒、釋、道三家的理論，以融合西方民主政體。此外，嚴復也反對以暴力革命改造社會，希冀以溫和的方式來改良社會環境；¹⁷另一個代表爲杜亞泉，在五四後的西化聲浪中，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等人，先後發表了〈新舊思想之折衷〉、〈何謂新思想〉、〈過激思想與其防止策〉、〈我之新舊思想調和觀〉……等文章，試圖交融新與舊的價值觀。可以看到，近代中國的劇烈轉型下，在推進與保守的勢力中，另有學人選擇去適應時代的變化，這樣的學人並非沒有立場的隨波逐流，而是選擇用另一種「柔性」的方式來回應中國的劇變。

相較於新潮流的推動者與舊傳統的維繫者，在近代學術史當中，對於「適應型學人」的認識，應當要有一定的關懷。雖然所謂文化轉變上的「適應」或是「調和」，在一個轉變的時代下似乎沒有那麼引人注目，也無所謂「立德、立功、立言」的開創性，甚至讓人覺得沒什麼「主見」。但筆者認爲，這樣一種柔性的態度，某方面來說也代表中國文化之中「包容」的特性，而這些適應型學人在學術界的作爲以及他們的學術成果，其實也代表了近代中國在轉變的過程中，所呈現磨合與調整的結果，雖說這樣的一種學術態度有些矛盾，卻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在近代發展的過程中，是如何取得一個合宜的平衡點。

除了前述文獻所討論的各個對象，筆者在蒐羅研究資料的過程中也發現，東北學人金毓黻(1887-1962)，亦可作爲「學術圈的調和者」這一類型，主要的出發點有幾項：其一，金毓黻在其求學的歲月中(1892-1916)，恰好處於轉型時期的末端，中國在現代學術

¹⁷ 對於嚴復在思想上所反映的調和性，相關論述可參見黃克武，《惟適之安》(台北：聯經出版，2010)一書導論，頁 1-22。

的推動上，已有一定的社會基礎，金毓黻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學術訓練。其二金毓黻在其仕宦、教學的期間(1916-1936)，卻是在故鄉東北服務，身處在激烈的學術風暴圈之外；金毓黻對於當時的學術環境亦有關心，不過並未實際參與相關活動。其三，金毓黻雖非近代學術變革運動的主要推手或參與者，其著作在今日的學術研究上，卻帶有某些現代學術寫作的色彩，在今日讀來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¹⁸

針對以上三點，筆者希望能夠透過金毓黻的著作與生平經歷，探討金毓黻史學思想之特色，除作為對於「金毓黻研究」的補充外，希望也能為近代學術史的研究，補充近代學人在「調和」與「適應」的更多層面向。

第二節 研究回顧

在台灣以金毓黻為專書或學位論文研究主題者較少，刊載於學術期刊、雜誌的文章也有限。目前已知台灣學界發表與金毓黻有關的學術文章有兩篇：一為早期《傳記文學》雜誌所刊載的「民國人物小傳」系列，有關於金毓黻簡略生平介紹，包含生卒、學經歷、相關著作等。¹⁹另一文章為叢佩遠與柴菅所著〈金毓黻與《遼海志略》奉天抄本〉。²⁰《遼海志略》為清代隋汝齡所編輯之方志，該書成書於清咸豐二年(1852年)，但百年以來未有刻本，僅有抄本流傳，而原稿已於1930至1940年代間佚失，而其餘抄本皆有殘缺。其中「奉天抄本」較原稿儘缺四冊，尚稱完備，金毓黻是首位對於《遼海志略》加以整理與利用的學者。本文透過金毓黻《靜晤室日記》中的記述以及奉天抄本的內容，介紹《遼海志略》一書的流傳、奉天抄本的來歷與內容，以及金毓黻在此抄本中所作的整理，以提供東北史研究的史料與研究方向。

中國方面對於金毓黻的研究則有相對豐富的成果，但相對其他民國學人，尚在起步之中。對於金毓黻的研究主要分成兩個區塊，其一是對金毓黻的文獻整理，其中以《靜晤室日記》的整理與出版，是近年較為顯著的成果，也是金毓黻研究中相當重要的史料。

¹⁸ 文中對於金毓黻生平的斷限，依據趙鳴歧，〈金毓黻與《靜晤室日記》〉，《書目季刊》，3，(台北，1992)，頁3-4。

¹⁹ 該系列後編輯出版為《民國人物小傳》叢書(劉紹唐主編：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金毓黻之介紹收錄於第十一冊，頁126-132。

²⁰ 叢佩遠 柴菅，〈金毓黻與《遼海叢書》奉天抄本〉，《大陸雜誌》1990年第5期，頁206-211。

²¹而在日記出版之前，則有刊載於學報上的《金毓黻學術年譜》(初稿)，²²該年譜的編寫以抽取《靜晤室日記》中，關於金毓黻的閱讀心得與學術札記，進行綱要整理，對於金毓黻的學術經驗，本年譜有很清楚的介紹。而較為晚近者，有梁啓政與張韜主編之《金毓黻研究文集》，²³整理近年來中國方面關於金毓黻的學術研究。另外，對於金毓黻其他文獻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當中。

另一項是期刊學報上的專文，或是以金毓黻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自 1980 年代迄今，累積了不少的成果。而在范壽琨〈金毓黻先生學術思想研究概述〉²⁴與霍明琨〈大陸近三十年金毓黻研究綜述〉二文中，²⁵分別整理介紹在 1997 年與 2010 年之際，回顧對於中國自 1980 年代以來關於金毓黻相關學術研究。以下藉此二文與筆者所蒐羅之文章，說明中國方面在「金毓黻研究」的概況。

最初對於金毓黻的學術書寫並非是一個專門的主題，而是在談論中國近代東北史地研究，以及史學史研究的發展中，提及金毓黻的學術成果與貢獻，作為銜接學術發展的環節。在早年有羅繼祖〈編輯東北史叢書資料爭議〉、²⁶陳其泰〈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成果——讀劉節先生《中國史學史稿》〉、²⁷葛兆光〈談史學史的編纂——兼評朱杰勤著《中國古代史學史》〉等文。²⁸近年討論這兩區塊學術發展的文章中，有周文玖〈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的學術系譜〉、²⁹王夏剛〈抗戰時期的中國東北史研究〉、³⁰顧奎相〈承先啓後 繼往開來——遼寧史學百年回顧〉等文也屬於這樣的類型。³¹這些文章雖非以「金毓黻」個人為論述重心，但從行文的脈絡中，可以觀察中國近代東北史與史學史的發展中，金毓黻在各個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如顧文將金毓黻列為遼寧地方史

²¹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小組《靜晤室日記》，遼寧：遼瀋書社，1993。

²² 《金毓黻學術年譜》(初稿)，長春：學術研究叢刊編輯部，1987。

²³ 梁啓政 張韜主編，《金毓黻研究文集》，長春：吉林教育音像出版社，2008。

²⁴ 范壽琨〈金毓黻先生學術思想研究概述〉，《北方文物》，3，(黑龍江，1997)，頁 90-93。

²⁵ 霍明琨 曲強〈大陸近三十年金毓黻研究綜述〉，《黑河學院學報》，4，(黑河，2010)，頁 95-99。

²⁶ 羅繼祖，〈編輯東北史叢書資料爭議〉，《史學集刊》，12，(長春，1982)，頁 39-41。

²⁷ 陳其泰，〈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成果——讀劉節先生《中國史學史稿》〉，《史學史研究》，6，(北京，1983)，頁 33-36。

²⁸ 葛兆光，〈談史學史的編纂——兼評朱杰勤著《中國古代史學史》〉，《史學史研究》，6，(北京，1983)，頁 65-80。

²⁹ 周文玖，〈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的學術系譜〉，《回族研究》，2(寧夏，2005)，頁 98-103。

³⁰ 王夏剛，〈抗戰時期的中國東北史研究〉，《大連大學學報》，26：5(瀋陽，2005)，頁 91-95。

³¹ 顧奎相〈承先啓後 繼往開來——遼寧史學百年回顧〉，《社會科學輯刊》，4，(瀋陽，2001)，頁 122-127。

學中，在發展初期成果最為豐碩，同時也具有開創性的學人，是為遼寧史學的先導性學者。³²不過也有如周文與王文，只提及金毓黻之名以及學術成果，並無特別指出金毓黻的學術貢獻與地位。

而在金毓黻的眾多研究當中，根據研究取向又可劃為三類：第一類是以金毓黻「個人」為中心的討論，也是研究金毓黻最初的途徑。自 1980 年代中期後，與金毓黻有所交誼的學人，先後撰寫關於金毓黻的生平記述，前文所述在台灣《傳記文學》刊載的金毓黻簡傳，為熊尚厚〈金毓黻〉，³³金毓黻好友金景芳，也著有〈金毓黻傳略〉一文。³⁴關於金毓黻的傳記書寫方面，同時也帶有對金毓黻學術成果的整理，相關的文章有：范壽琨〈金毓黻先生研究綜述〉、³⁵郭君〈金毓黻生平及著作簡介〉、³⁶王鼎〈瀋陽才子 史壇名家—金毓黻生平事略〉、³⁷傅振倫〈金靜庵先生行誼〉等文。³⁸

另一項傳記的書寫取徑從金毓黻的「學術方法」著手，如楊仁凱〈史壇巨匠 遺範流芳—記金毓黻先生治學與任事之道〉、³⁹范壽琨〈記金毓黻先生的治學道路初探〉、⁴⁰〈披沙揀金 銖積寸累—記勤奮治學的金毓黻先生〉等文，⁴¹近年則有霍明琨〈東北史壇巨擘 金毓黻早年治學轉折點探析〉。⁴²其中霍文不同於前述文章說明金毓黻一生，而著重於金毓黻 1925 年以前的生平，說明金毓黻選擇走入治史一途的心態轉折，此文帶有某種「心理史學」的書寫，透過金毓黻日記的紀錄，說明金毓黻對自己求學歷程的反省，以及金毓黻走上學術道路的原因，對於金毓黻的精神層面研究是一項突破，也是本命題可供參考的一點。

金毓黻傳記至 90 年代依然持續書寫，書寫的內容也較過去專門，如邢玉林〈東北

³² 顧奎相〈承先啓後 繼往開來—遼寧史學百年回顧〉，頁 123。

³³ 熊尚厚，〈金毓黻〉，收自張舜徽編著《中國史家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頁 333-337。

³⁴ 金景芳，〈金毓黻傳略〉，《史學史研究》，3，（北京，1986），頁 71-74。

³⁵ 范壽琨，〈金毓黻先生研究綜述〉，《東北史研究導報》1988 年第 1 期，頁 3。

³⁶ 郭君，〈金毓黻生平及著作簡介〉，《圖書館學研究》，4，（長春，1985），頁 86-87。

³⁷ 王鼎，〈瀋陽才子 史壇名家—金毓黻生平事略〉，《圖書館學刊》，1987 年第 5 期，頁 20-24。

³⁸ 傅振倫，〈金靜庵先生行誼〉，《黑龍江史志》，4，（哈爾濱，1984），頁 51-55。

³⁹ 楊仁凱，〈史壇巨匠 遺範流芳—記金毓黻先生治學與任事之道〉，《遼陽文物學刊》，2，（瀋陽，1987），頁 36-39。

⁴⁰ 范壽琨，〈記金毓黻先生的治學道路初探〉，《社會科學戰線》，3，（吉林，1987），頁 212-218。

⁴¹ 范壽琨，〈披沙揀金 銖積寸累—記勤奮治學的金毓黻先生〉，《學術研究叢刊》，4，（吉林，1987），頁 21-27。

⁴² 霍明琨〈東北史壇巨擘 金毓黻早年治學轉折點探析〉，《黑龍江社會科學》，6，（哈爾濱，2009），頁 94-96。

史學巨擘金毓黻》⁴³、趙鳴歧〈金毓黻與《靜晤室日記》〉⁴⁴、石華〈著名方志理論家金毓黻〉⁴⁵、崔燾與杜尙俠〈史壇巨匠金毓黻〉⁴⁶、楊林生〈金毓黻學案〉等文。⁴⁷

大體而言，諸多對於金毓黻的傳記書寫、眾多文章內容大同小異，甚至有許多重複的論述，除了某些細節的差異，如金景芳提及金毓黻生平，特別指出金毓黻家族背景，而邢文則著重說明金毓黻在東北史地、東北史學界的貢獻，楊文則在生平介紹之餘，引用了金毓黻部分學術作品，來強調金毓黻的學術特色。在眾多對於金毓黻的傳記寫作當中，筆者認為金景芳之文與刊載於《傳記文學》之金毓黻生平簡述，以及楊文較有參考價值。主要在於金景芳與金毓黻屬於同鄉，又有深厚的交誼，書寫上有比較細微的說明；《傳記文學》所刊載熊氏之文，則對於金毓黻一生簡歷，在時間軸的劃分上有清楚的區隔，若要進行時空事件的對比，較為便利；楊文所編之學案，是近年出版最新之金毓黻簡傳，同時也附上金毓黻相關學術作品，有助於對照金毓黻之生平與其學術面向的特色。

第三個取徑為金毓黻的交誼討論，如金恩輝〈學者的品德、友誼和骨氣——兼談王重民先生和金毓黻先生的君子之交〉、⁴⁸梁啓政〈金曉邨與金靜庵先生交誼述略〉。⁴⁹以及初國卿所撰〈遼海兩大師的學術情誼——紀念金毓黻逝世 50 週年李文信逝世 30 週年〉、⁵⁰〈金毓黻與繆潤紱——紀念金毓黻逝世 50 週年〉等。⁵¹這些學人或為金毓黻的長輩，或為金毓黻的晚輩，他們在金毓黻的交誼上，或對於金毓黻的學術做出了輔助，或受到金毓黻對他們生活上的幫助。如前文所述之金景芳(字曉邨)，是在 1931 年 4 月和金毓黻在同一工作單位上服務而結識，金景芳小金毓黻 15 歲，在兩人結識的過程中，有「教學相

⁴³ 邢玉林，〈東北史學巨擘金毓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北京，1990)，頁 96-99。

⁴⁴ 趙鳴歧，〈金毓黻與《靜晤室日記》〉，原載於《社會科學戰線》1992 年第 2 期。後經台灣方面轉載至《書目季刊》1992 年第 3 期。

⁴⁵ 石華，〈著名方志理論家金毓黻〉，《新疆地方志》，1992 年第 2 期，頁 37。

⁴⁶ 崔燾 杜尙俠，〈史壇巨匠金毓黻〉，收自崔燾 杜尙俠著，《遼海文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頁 256-258。

⁴⁷ 楊林生，〈金毓黻學案〉，收自張豈之主編《民國學案》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頁 247-260。

⁴⁸ 金恩輝，〈學者的品德、友誼和骨氣——兼談王重民先生和金毓黻先生的君子之交(一)〉，《圖書館學刊》，1，(瀋陽，1999)，頁 61-63。

⁴⁹ 梁啓政，〈金曉邨與金靜庵先生交誼述略〉，《通化師範學院學報》，11，(長春，2007)，頁 62-85。

⁵⁰ 初國卿，〈遼海兩大師的學術情誼——紀念金毓黻逝世 50 週年李文信逝世 30 週年〉，《芒種》，192，(遼寧，2012)，頁 38-41。

⁵¹ 初國卿，〈金毓黻與繆潤紱〉，《文化學刊》，4，(瀋陽，2012)，頁 173-176。

長」的情誼。九一八事變到滿洲國治理期間，金景芳協助金毓黻在學術寫作上的校對，而金毓黻也給金景芳一些工作機會與學術指導，在抗戰期間更一同於四川任教。兩人的關係直到 1949 年後，因為工作地點分隔才漸告淡薄，⁵²但從第一份關於金毓黻較為清楚的傳記，出自金景芳之手而言，顯見兩人之間的交誼深厚，非常人所能理解。

金文藉由金毓黻與東北目錄學者王重民間的交誼，主要借金毓黻在東北文獻版本的學識給予王重民編輯方志的協助這點，說明王重民對於方志學、目錄學等學問治學的態度。關於兩人之間實際的交誼情況，金文透過《靜晤室日記》的整理，發現金毓黻與王重民的交誼，來自於史料蒐集的過程中，金毓黻與王重民相互提供意見，進而有所交誼。從金文可以得知金毓黻與王重民的學術交誼外，也可以得知中國近代在各類史料編輯工作中所蒐羅到的各項珍貴文獻，同時也反映出金毓黻個人對於文獻的重視以及掌握。

初文所述二人繆潤紱與李文信，分別為東北舊學人與東北考古學家。金毓黻對於繆潤紱這一長輩，多向其請教詩文方面的學問，更透過個人工作協助出版繆潤紱的相關文集，保存屬於東北耆老的遺產；李文信與金毓黻則是於 1935 年，在滿洲國的考古工作下認識。1945 年對日作戰結束後，李文信與金毓黻共同整理了瀋陽遼東地區的文獻、文物，給東北地區的文化資產提供了相當完善的保護。透過初文，我們可以看到金毓黻對於東北耆老的尊重，還可以看到金毓黻對於東北文物保存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心力。而綜觀金毓黻的交誼研究可以發現，了解金毓黻的交誼狀況，除可得知他在學術上所受到的外在幫助與影響外，間接的也勾勒出中國近代東北地區學術界發展的概況。

最後一項取徑筆者稱之為「微觀書寫」，是近年「金毓黻研究」的特色，指的是探討金毓黻周邊性、或是生平較為細微的問題，如遊歷、學術經歷的正確性、收藏特點等，這類書寫可看作是前文所述傳記書寫的延伸或補充，例如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一文，⁵³說明金毓黻 1936 年間赴日搜羅東北史地文獻，這些文獻的特色以及內容。而微觀書寫方面，通化師範學院梁啓政著有許多相關研究，如：〈略論東北

⁵² 梁啓政，〈金曉邨與金靜庵先生交誼述略〉，頁 65-66。

⁵³ 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遼寧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6，(瀋陽，2007)，頁 79-82。

史學家金毓黻之藏書》、⁵⁴〈金毓黻藏書印初考〉、⁵⁵〈金毓黻三次域外訪書述評〉、⁵⁶〈金毓黻之渤海上京研究與東京城訪古〉、⁵⁷以及梁啓政與王峰合著〈金毓黻執教中央大學和東北大學經過〉等文。⁵⁸以上文章可以看到以金毓黻的「藏書」和「遊歷」為主，由於金毓黻一生藏書、購書甚豐，可以說其學術經歷和「書本」脫離不了關係，梁文針對金毓黻的藏書著手分析，一方面理解金毓黻對學術的態度與學術基礎，再者也提供有心進行「金毓黻研究」者，能夠迅速理解金毓黻學術的特性。而梁文對於金毓黻於四川執教東北大學與中央大學的經歷，歷來有一些模糊之處，透過對時間的爬疏，介紹金毓黻在兩校間所擔任之職位的不同，以釐清中國學者對於金毓黻此一時期學術生涯的誤解。⁵⁹

第二類是以金毓黻學術成果為基礎的討論，及前文所述之東北史地與史學史研究。對於金毓黻東北史地研究的學術討論可分為兩類，最基礎者為討論金毓黻東北史研究的成果與金毓黻對東北史地的史料蒐羅，如陳澧〈《奉天通志》述略〉、⁶⁰甘孺〈遼海叢書〉、⁶¹定宜庄〈《東北通史》評介〉、⁶²王慶丰〈金毓黻與《遼海叢書》〉、⁶³羅繼祖〈金毓黻先生與《遼海叢書》〉等文。⁶⁴其中定文是目前所見對於金毓黻《東北通史》一書最早的單篇評論文章，也指出了金毓黻研究東北史地的角度，以「民族」為切入點，對於金毓黻在東北史地系統化的書寫，給予了正面的評價。而如甘文、羅文、王文，則主要說明《遼海叢書》編輯的目的，在於和當時日本學界，以內藤湖南為主要發起人編寫的《滿蒙叢書》相對，在傳統叢集刊刻的基礎下編寫，而這套叢書也給予日後研究東北史地、遼金史、渤海史等學門提供豐富的史料編纂。

晚近對於金毓黻的東北史研究討論，加入了寫作動機與內涵兩方面，如榮文庫〈試

⁵⁴ 梁啓政，〈略論東北史學家金毓黻之藏書〉，《蘭台世界》，29，(瀋陽，2009)，頁 37-42。

⁵⁵ 梁啓政，〈金毓黻藏書印初考〉，《北方文物》，3，(哈爾濱，2009)，頁 89-94。

⁵⁶ 梁啓政，〈金毓黻三次域外訪書述評〉，《社會科學戰線》，5，(長春，2008)，頁 104-106。

⁵⁷ 梁啓政，〈金毓黻之渤海上京研究與東京城訪古〉，《北方文物》，9，(哈爾濱，2008)，頁 37-42。

⁵⁸ 梁啓政 王峰，〈金毓黻執教中央大學和東北大學經過〉，《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8：5，(長春，2007)，頁 23-25。

⁵⁹ 梁啓政 王峰〈金毓黻執教中央大學和東北大學經過〉，頁 22。

⁶⁰ 陳澧，〈《奉天通志》述略〉，《瀋陽師範學院學報》，1，(瀋陽，1982)，頁 68-73。

⁶¹ 甘孺，〈遼海叢書〉，《史學集刊》，2，(長春，1982)，頁 71。

⁶² 定宜庄，〈《東北通史》評介〉，《史學史研究》，2，(北京，1983)，頁 22-23。

⁶³ 王慶丰，〈金毓黻與《遼海叢書》〉，《社會科學輯刊》，1，(瀋陽，1986)，頁 70-74。

⁶⁴ 羅繼祖，〈金毓黻先生與《遼海叢書》〉，收自羅繼祖著《魯詩堂談往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312-316。

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⁶⁵朱慈恩〈金毓黻與《東北通史》〉、⁶⁶武麗瑋〈傅斯年《東北史綱》與金毓黻《東北通史》之比較〉。⁶⁷評述金毓黻在東北史地的研究成果，與介紹金毓黻《東北通史》一書之內容、書寫動機以及寫作方法。榮文對於金毓黻在東北史地研究指出有三個主要貢獻，其一，對於東北總略與東北史地的研究，其二，對於東北史史料的整理，其三，編纂東北的地方志。⁶⁸可以看到這些主要工作都屬於史料的基礎編輯，也凸顯了金毓黻史學研究的一項特色。而朱文與武文對於金毓黻《東北通史》一書的評論，朱文著重於該書的寫作背景、目的，以及金毓黻編寫本書的特點與目的，是近年對金毓黻《東北通史》一書短篇評論較為全面的一篇，但全文泰半引用金毓黻原著話語，作者個人似乎以編輯為主，甚為可惜。武文則將金毓黻與傅斯年《東北史綱》進行對比，就成書動機而言，兩者都帶有對日本滿蒙論述的批駁，欲以學術之法相互對抗；兩書相互比較上，對於史料的使用都相當重視，然而武文的觀點上：傅氏之作於戰火之下倉促完成，相較於金毓黻長期對東北史地的用心，便顯得薄弱。⁶⁹

晚近學界對金毓黻的研究取徑，則從金毓黻過往的研究成果出發，進一步在相關的主題上開展。這些文章或對於文獻的內容進行探究，或補充與考察關於東北史研究的相關問題。如趙愛明〈《奉天通志》人物部分訛誤簡析〉、⁷⁰張鈞〈《渤海國志長編》(上冊)標點校勘〉、⁷¹曉辰〈也談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⁷²盧偉〈渤海國湖洲志所及湄沱湖問題〉、⁷³趙紅梅〈渦沮族稱謂探析〉、⁷⁴姚玉成〈渤海俗所貴者“太白之菟”考辯〉、⁷⁵王國成〈唐代渤海國姓氏研究〉。⁷⁶寧夢辰〈黃龍府新考---《靜晤室日記讀後》〉等文。⁷⁷除

⁶⁵ 榮文庫，〈試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5，(瀋陽，1994)，頁 49-54。

⁶⁶ 朱慈恩，〈金毓黻與東北通史〉，《蘭州學刊》，2008 年第 11 期，頁 140-142。

⁶⁷ 武麗瑋，〈傅斯年《東北史綱》與金毓黻《東北通史》之比較〉，《長治學院學報》，28：4，(長治，2011)，頁 77-80。

⁶⁸ 榮文庫，〈試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5，(瀋陽，1994)，頁 49。

⁶⁹ 武麗瑋，〈傅斯年《東北史綱》與金毓黻《東北通史》之比較〉，頁 78-79。

⁷⁰ 趙愛明，〈《奉天通志》人物部分訛誤簡析〉，《圖書館學刊》，2，(瀋陽，1991 年)，頁 53-55。

⁷¹ 張鈞，〈《渤海國志長編》(上冊)標點校勘〉，《牡丹江師範學報》，3，(牡丹江，1991)，頁 51-55。

⁷² 曉辰，〈也談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北方文物》，3，(哈爾濱，2003)，頁 80-81。

⁷³ 盧偉，〈渤海國湖洲志所及湄沱湖問題〉，《北方文物》，4，(哈爾濱，2006)，頁 37-40。

⁷⁴ 趙紅梅，〈渦沮族稱謂探析〉，《黑龍江民族叢刊》，2，(哈爾濱，2006)，頁 82-84。

⁷⁵ 姚玉成，〈渤海俗所貴者“太白之菟”考辯〉，《史學集刊》，2，(長春，2008)，頁 75-80。

⁷⁶ 王國成，〈唐代渤海國姓氏研究〉，《北方論叢》，4，(哈爾濱，2005)，頁 96-100。

⁷⁷ 寧夢辰，〈黃龍府新考---《靜晤室日記讀後》〉。該文分作上下篇刊載於《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篇刊於 2003 年第 1 期，頁 29-33；下篇刊於 2003 年第 6 期，頁 29-33。

趙文帶有文獻考證的目的外，其餘文章皆與金毓黻的渤海史研究相關，以渤海國中的民族、氏族、地理……等主題進行書寫，由此也可以得知，渤海史地自金毓黻以來，一直有許多值得開發的部分，而金毓黻當時的學術整理，也給與今日學界良好的基礎。

金毓黻的另一個較為著名的學術成果是史學史的研究。關於這方面的論述，最早以瞿林東〈史學怎樣尋找自己——重讀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一文，⁷⁸對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一書作了全面的介紹，諸如金毓黻本書寫作的過程，全書寫作帶有考據性質的操作方法，以及金毓黻本書對於「中國史學史」學門初開展時，對這一學門書寫方向的定位。近年則有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重讀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⁷⁹蔣正虎《論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影響》等文，⁸⁰針對《中國史學史》一書內容進行評論。周文指出，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成書之後，1944年交付商務印書館刊印，其後由教育部審定為大學教科用書，這樣的現象，標誌著「中國史學史」學門已正式進入大學課程中，⁸¹而金毓黻本書成書之後，對於「中國史學史」教科書的編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⁸²

而霍明琨〈再析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撰寫中的影響因素〉、⁸³鄭善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定名初考〉、⁸⁴張凱〈改造舊史編纂新史：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之學術旨趣〉，⁸⁵則分析《中國史學史》書寫過程的外在影響，金毓黻史學史書寫「概念上」的考察，以及該書的書寫特色，對於該書有不同層面的剖析。例如霍文指出，金氏此書的基礎，來自於梁啟超的發想與朱希祖的學術訓練；鄭文則說明金毓黻在命名此書時，擺盪於「史學史」與「史學考」之間，反映金毓黻在傳統學術觀與現代學術潮流的取捨；張文則認為，金毓黻在史學史的編寫與研究上，與整理國故運動的精神類似，都有重新審視傳統

⁷⁸ 瞿林東，〈史學怎樣尋找自己——重讀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1998），頁185-190。

⁷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重讀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煙台師範學院學報》，3，（煙台，2003），頁47-51。

⁸⁰ 蔣正虎，〈論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影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5。

⁸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重讀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頁47。

⁸²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重讀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頁51。

⁸³ 霍明琨，〈再析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撰寫中的影響因素〉，《安徽史學》，4，（合肥，2010），頁5-10。

⁸⁴ 鄭善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定名初考〉，《史學史研究》，1，（北京，2010），頁121-123。

⁸⁵ 張凱，〈改造舊史編纂新史：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之學術旨趣〉，《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開封，2012），頁81-87。

史學，以及企圖建立新史學寫作的格局。

最後一類，是藉由「金毓黻」這一視角，討論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發展。這一取徑的研究可分兩方面：其一是將金毓黻置於中國近代學術成果的發展中，討論他的學術特色與重要性。如趙慶雲〈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一文，介紹 1940 年後金毓黻在國史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期間，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以及資料編輯，包含太平天國史料與明清史料的出版，給予現代學者研究上的便利。⁸⁶鄭善慶〈20 世紀史家與《二十六史》的整理〉，述及金毓黻在近代對二十六史新校標點本的整理過程中，對於《清史稿》的編輯點校貢獻。⁸⁷另外桑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述及金毓黻在「中國史學會」中，對於期刊編輯、擔任行政職務，為近代中國的史學研究社群，提供優良的學術研究環境。⁸⁸

其二是在金毓黻的學術生涯中，他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圈中扮演何種角色，關於這點以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分合〉一文為代表，本文透過金毓黻的學術生涯，討論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學分南北」、「新舊分合」的現象。筆者簡述本文論點如下：對近代中國而言，「南」與「北」除了地理上的差異，也有思維模式的不同，在近現代中國裡，學風、觀點的不同，象徵著對於中國過去、現在立場的不同，也象徵與現今政權的合作或對立。⁸⁹金毓黻所學雖為小學之學，但過去在北京大學受教，有了這樣特殊的身分，讓他在接觸政治圈上有一些便利性。⁹⁰南北學人學風的不同，讓學人之間有某些對立的情形，金毓黻透過各方管道，在中央大學任教時，以折衷的態度品評各家學說，並且邀請各方學人來校講學，闡述各家學說與觀點，調和了當時尖銳的「南北學風」的對立，由此看出金毓黻「持平」的人格與學術風格。⁹¹筆者觀察，桑文除了補充金毓黻在抗戰時期的學術經歷之外，更描繪了抗戰時期學人之間因學風、學派不同而相互角力的現象，又，本文對於金毓黻也有較為客觀的敘述，是筆者認為現今「金毓黻」研究中，較為公允的一篇。

⁸⁶ 趙慶雲，〈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界》，2，(合肥，2008)，頁 227-236。

⁸⁷ 鄭善慶，〈20 世紀史家與《二十六史》的整理〉，《滄桑》，4，(太原，2010)，頁 125-128。

⁸⁸ 桑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5，(北京，2004)，頁 116-139。

⁸⁹ 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中國近代史研究》，5，(北京，2008)，頁 22。

⁹⁰ 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頁 24。

⁹¹ 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頁 30-34。

第三節 研究討論與行文安排

以上，是近年學界對金毓黻研究的一些初步的整理。觀察上述諸多關於金毓黻的研究，除筆者所劃分的三種研究取徑外，這些研究的論述還有一些特色，筆者同時也對這些研究特色做出回應：

其一，著重於金毓黻的「實際敘述」。以上研究不論在金毓黻的生平交誼或學術成果的討論，綜括來說都是金毓黻「外在的面貌」。實際面的理解有助於快速認識學人，然而眾多文章對於金毓黻的實際敘述，多有雷同與重疊，無法得知現今「金毓黻研究」的焦點與主要論點，不免有千人一面之感。再者，眾多的「實際面敘述」，相對「思想性敘述」就相對稀少，尤其眾多研究也都再三強調金毓黻是一個「重要的學人」，應當有其思想的內涵，或是相較當代學人，有其思考層面的特殊性，但鮮少有論述來比較金毓黻與同時學人的思想差異，或是金毓黻本身的思想特色。

其二，對於金毓黻的「高度讚揚」。觀察大部分的研究文章，對金毓黻都有如下的敘述，稱其為：「近代文史大家」、「享譽海外」、「著名愛國學者」、「現代著名史家」。當然，金毓黻是否真能「服膺」這些響亮的稱呼，不得而知，也許在中國學界的研究與觀察上，金毓黻在近代學術的發展中確實有其份量。然而學人在學術成就上各有高下，為人處事亦是毀譽參半。即便如「教授之教授」的陳寅恪，在近年仍有學者重新檢討其學術成果，甚至對陳氏評以「下等」。⁹²相對於中國發展卅餘年的「金毓黻研究」，看到的大多是稱許，鮮少批駁，這是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

其三，是文章敘述的重複性。以筆者在資料蒐羅的過程之中，即發現不少篇研究文章，雖是刊載於不同學報，名稱也有所不同，但內容卻是相同的，例如霍明琨所著〈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早年治學轉折點探析〉與〈金毓黻早年赴黑龍江期間治學心態考索〉（《靜晤室日記》之所見），以及趙慶雲〈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與〈論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此二文名稱不一，但是書寫內容卻相同。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出現今中國學界對於金毓黻的研究上，有一些選題的極限。

因此，針對上述三點，筆者本文所命題「金毓黻史學研究與史學思想」，第一目的

⁹² 近年對於陳寅恪的新評價，可參見盧建榮《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一書。台北：時音出版，2010。

即為回應現今中國學界的「金毓黻研究」，以補充對於金毓黻個人在思想層面的討論，豐富「金毓黻研究」的面向。再者，以身處台灣，對於東北或是金毓黻個人相對陌生的角度，重新理解金毓黻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而在基礎材料的使用上，選定金毓黻所著之《靜晤室日記》，以及氏作《東北通史》與《中國史學史》二書。《靜晤室日記》為金毓黻自 1920 至 1960 年間所書寫之日記，內容以讀書札記與生活隨筆為主，是近年「金毓黻研究」中重要的一手史料。另外筆者為討論金毓黻之史學成就，選定《東北通史》與《中國史學史》二書，在於此二書屬於金毓黻眾多學術作品當中，帶有通論性質與系統建構特色的著作，藉以理解金毓黻的史學思想宏觀的一面。

另外筆者在此要對於「史學思想」一詞作出定義：所謂的史學思想，可以說是個人對於歷史的「態度」。這種態度套用於史學家之上，反映史學家對於自己在歷史研究中的觀點，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提及《史記》一書的寫作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⁹³前文所述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所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反映陳氏「獨立自由問學」的觀點；⁹⁴而在 1901 年，梁啟超所提出「新史學」一說，應對中國傳統史學而提出的四個理論：「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反映出梁任公對於新舊史學出發點的認識。⁹⁵這些實際的語彙，可以說是史學家「史學思想」的實際展現。

因此在這樣的邏輯中，本文的行文結構如下：首章為緒論，說明全文問題意識，相關研究回顧、研究討論，以及筆者對於本命題所要處理的方針。相關論述已於前文說明，便不在此贅述。第二章為「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形成」，屬於敘事性的一章。利用現有學術成果與《靜晤室日記》，說明金毓黻的三個層面：生平家世、問學經歷、學術回應。透過這三個面向來觀察金毓黻的史學思想如何形成，以及這之中所蘊含的學術特色，以作為接續章節中，對金毓黻學術研究分析的背景。第三、四章以「金毓黻史學研究」為

⁹³ 關於司馬遷這三句宣言的討論，台灣學界有阮芝生的深入研究，可參見氏作《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3。

⁹⁴ 另外對於陳寅恪史學的詳細討論，可參考宋德熹著，《陳寅恪中古史學探研：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例》，臺北：稻鄉出版，2004。

⁹⁵ 對於梁啟超的史學觀，早期杜維運、汪榮祖等人皆有文章討論，近年較為整合性的論述，有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刊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 年第 4 期。

主題，進入金毓黻學術生涯中較爲人所知的兩個領域：東北史與史學史研究。此二章的行文架構大體相似，首先就近代中國學術史中，東北史與史學史研究的發展上，簡略定位金毓黻在這兩項學術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接續介紹金毓黻的兩部著作：《東北通史》與《中國史學史》二書，觀察金毓黻的學術方法，以及其對於東北史與史學史方面所關注的角度，並分析此二書的特點，是否與前章所反映的知識與思想背景有關。最末一章爲結論，以本命題「金毓黻史學思想」爲主，在前三章的基礎上，說明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內涵、特色，或是如前文所述，金毓黻對於歷史學抱持何種「態度」，探討金毓黻在中國近代的學術發展之中的地位與貢獻，給予金毓黻在民國近代學人之中的定向。

第一章 金毓黻其人與其史學思想的形成

本章屬敘述性的章節，說明金毓黻兩個主要史學思想：「去中原中心」史觀與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主要對於金毓黻在成長的過程中，所接受的各項知識與思想資源，如：承學的經歷、個人閱讀的傾向與學術研究歷程的變化，以及金毓黻在日記之中，對於當代學界問題的回應。對此發掘金毓黻史學思想形成的階段，以及影響金毓黻與思想變化的脈絡與因素。

第一節 金毓黻之生平⁹⁶

金毓黻於 1887 年出生於遼寧遼陽，家族在過往隸屬清漢軍正白旗。⁹⁷6 歲時入村塾學習，16 歲時因家境問題而輟學從商，但仍對求知存有熱情。從商學習之時，先後閱讀了清初理學家陸隴其、張伯行各項作品，以及朱熹《通鑑綱目》等著作。19 歲時受到遼陽啓化高等小學堂校長白永貞幫助，重新入學，兩年後進入奉天省立中學堂就讀，並且於 1913 年考取北京大學文科。北大就學期間，金毓黻師承朱希祖與黃侃，此二人有個共通點：均為章太炎門下。金毓黻受業於朱、黃二人，隨朱希祖學習史學、文學史等科目；與黃侃學習小學、文字學等。此一學習經歷，對金毓黻日後的治學，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1916 年自北大畢業，金毓黻返回東北。在 1916 年至 1936 年間，先後擔任許多教職與官職，如奉天省第一中學堂、瀋陽文科專門學校等教職；以及擔任奉天省議會秘書、吉長道總務科長、長春電燈廳廳長等行政職，同時也於 1920 年 3 月進行日記的書寫，記錄了工作之餘的閱讀心得以及學術筆記，但金毓黻也多次於日記中表明，自己對於「行政職場」的不適應，還是希望以「讀書」為志業。在 1927 年間，在白永貞請求合作下，

⁹⁶對於金毓黻的傳記書寫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本節但以熊尙厚〈金毓黻〉，金景芳〈金毓黻傳略〉，趙鳴歧〈金毓黻與《靜晤室日記》〉，以及近年所出版，由張豈之主編《民國學案》中〈金毓黻學案〉一文，綜合其內容來鋪陳。

⁹⁷關於家族的源頭，作為「漢軍八旗」後裔的金毓黻，有其血緣的特殊性。然而對於金毓黻這樣特殊的背景，現今的研究鮮少從這一角度去討論其史學特色。談及金毓黻家世背景相關，可參見初國卿〈遼陽出了個金毓黻〉一文：金毓黻之故鄉於遼陽「後八家子村」，是一個由邱、梁、夏、朱、李、佟、蘇、金八姓組成的村落，是一漢族與滿族的綜合聚落。初國卿，〈遼陽出了個金毓黻〉，《中國地名》，10，（瀋陽，2009），頁 89。在此，受限於資料的收集以及解讀，對於金毓黻在治學過程中，血緣背景是否影響其史學觀點，筆者不敢就此定論。然而，這樣一身分的特殊性，對於金毓黻在日後投入東北史地研究上，應當有其影響。

金毓黻著手第一份學術性的工作：《遼東文獻徵略》與《長春縣志》的書寫，也奠定了金毓黻對東北史研究的學術途徑。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金毓黻人在遼寧，遭日軍拘捕軟禁。因為其人在東北地區的名望，日方也向其商洽，配與待遇優渥的官職，希望能夠協助日人在東北的行政管理，不過金毓黻都一一婉拒。但在同鄉臧士毅的保護下，他還是擔任了一些文書性的職位，如遼寧省政府教育廳長、滿州圖書館館長等，他也藉著這些職務，使其在東北史地的研究上能無間斷，更於1935年至1936年間，先後三次至朝鮮、日本搜尋資料，也認識了當時的日本漢學家：白鳥庫吉、稻葉君山、內藤湖南等人。在滿洲國任職期間，他也編輯出版了《渤海國志長編》、《遼海叢書》、《奉天通志》、《宣統政記》等史料集叢。

1936年4月，金毓黻第三次前往日本，在東京待了三個月之後，7月，自東京化名返回中國，至上海靠岸。在上海，尋訪黃炎培、蔡元培二人，藉由兩人的引薦，金毓黻前往南京與傅斯年會面，在傅斯年的幫助下，至南京中央大學任教，至此，金毓黻正式的學術生涯展開。這一時期，也是金毓黻與新文化學人、傳統學人交流的時候。⁹⁸翌年，中日戰爭爆發，校地遷移，中央大學與東北大學兩校，分別遷校於四川沙坪壩與三台，戰爭期間，金毓黻來往兩校從事教職與校務行政，先後擔任沙坪壩中央大學史學系系主任，並於三台東北大學成立「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首創中國區域史地研究的專題研究中心。在四川任教期間，金毓黻分別教授史學史與東北史二科，先後也成書《東北通史》、《中國史學史》兩部在其學術生平聞名的著作，並且與羅香林、李濟、傅斯年、黎東方等人，發起組織「中國史學會」。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翌年金毓黻即隨東北考察團前往東北，視察戰後東北文物相關保存事宜，並辭去原先在四川擔任的教職、行政職，轉往東北服務，進入國史館擔任修纂，並且受教育部之命，著手籌備「瀋陽博物館」的建設，日後，兼教於瀋陽東北大學史學系，並且於東北圖書館整理出明清內閣大庫中所藏檔案，編輯成《明清內閣大庫史料》。1949年，政權轉移至中國共產黨，國史館併入北大，金毓黻也轉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翌年，出版《太平天國史料》。1951年，因應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一事，編

⁹⁸ 對於金毓黻在中央大學對於學人間的新舊交流，相關論述，可參見研究回顧所舉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一文。

輯《五千年來中朝友好關係》一書。1952年，全國大專院校院系調整，金毓黻轉任至中國社會科學院，這也是金毓黻最後的學術工作。在社科院任職期間，金毓黻參與了「熱河赤峰遼墓」的發掘計畫，並且編輯《中國近代史料》太平天國一卷、《中國地震資料年表》，以及修訂過往《中國史學史》的內容與章節。

1962年8月3日，金毓黻病逝於北京，享年76歲。

第二節 治學路徑與知識養料

除了個人的生命經驗之外，學人自身在知識的探索與蒐羅上，也是相當重要的思想資源。就生平經驗的分段來看，金毓黻的學術生涯是開始於1936年抵達南京之後。不過在此之前，金毓黻在東北生活的十五年中，已有相當深厚的知識積累。雖然最初的工作不是學術研究相關，但是金毓黻對於知識探索的熱情並未因此而削減。從《靜晤室日記》的紀錄可以看到，在這十五年中，金毓黻的治學路徑與知識養料，呈現「三階段性」的變化。

最初，金毓黻對於自己的學術道路有一些期待：

余於學問一端，蓄願頗奢。以治史學起，未竟業。改治理學，又未竟，改治文學，仍無所得，又治小學、經學，旁及諸子。博則博矣，但引其端，未竟其緒，汨濫既久，終無所得。⁹⁹

這一句對自己問學龐雜的反思，反映了金毓黻初期的閱讀範疇，包含：史學、小學、理學、經學等，這些學門可說是中國傳統學問的一環，同時也顯示了金毓黻的知識基礎有濃厚的傳統風格。然而金毓黻為何治各門學問均未竟業？不得而知，不過幾經思考之後，金毓黻重新做出了這樣的學術規劃：

年餘以來，漸思由博返約，一志研究文學，而以史學輔之。文、史二科，界畫本不甚嚴，往者章實齋氏整理先代學術，嘗以文史同科，衍為通義，可為顯證。夫古今能文之士，類皆躬與修史之役，韓退之以修史為戒，而《順宗實錄》成於其手，餘子可知。且史文詳實高簡，非大手筆不能為，宋、元諸史，穢蕪冗雜，識者病焉，此即文章不工之咎。文以載事為執，事必資文以傳，二者相需甚殷，不

⁹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寧：遼瀋書社，1993），頁41。

可偏廢。余治文學而不廢言史，蓋有由也。且人世一切學問，無不屬史，章實齋云「六經皆史」。朱師遇先云「諸子十家皆出於史官，從而治經學、治理學、治小學、諸子，無一不與史學同科」。史之所包既廣，則於今日之研史學文，不啻治經學、小學與性理諸子也。能持此為定向，為正鵠，雖久久不變可也。¹⁰⁰

這種文史合一的觀點，對於其在日後的研究成爲某一項基礎。同時可以發現，金毓黻接續了章實齋與朱希祖的史學觀。不過在他看來，所謂的「六經皆史」意涵是這樣的：

…章實齋云：「六經皆史」，論者為至言。吾人日間所讀之書，無一不可當史視之。讀古書即讀古代史；讀報章雜誌即讀現世史；讀他人著作或詩文集，即讀個人史。自己作日記，亦一己之史也。今人多喜讀古書，以為有味（即余亦不免此病），不知古史故宜知，而今史尤宜知也。今史之宜知者，吾人所生之時代，與吾人一身關係綦切，一舉一措，無不受其束縛，一言一行，亦無不被其影響。吾人既非山林隱逸，絕意塵緣，於現世亦不能自外，故不惟宜知而已。…

…吾人於一切書籍，皆當以史目之。不為記事之作，史也；地理、政典之書，亦史也。即專門學術之書，為一人思想之所寄，亦即其個人之歷史。思想者，變動不居之物，而學者之歷史，即因其有變動，而有存在之價值。而研究之人，亦因其有變動，而興無限之興趣。於此等處，倘知留意，學業前途，必有進步。章氏之說，限於六經，余為推而廣之，以為此說，世有達者，或有取焉。…¹⁰¹

一切的書籍都可作為史籍而觀之，在金毓黻的治學與閱讀中，所謂的古籍不論性質，往往提供了史事的介紹與考察。因此金毓黻早期的閱讀，便集中在其所謂的「文」、「史」兩類書籍。而所謂「文類」的閱讀，則包含文人文集、書信、筆記、日記等，種類繁多，時間也從唐宋以降至明清兩朝，橫跨數代，不過仔細分類後可以發現，金毓黻主要的閱讀取向，以清代文人的作品為主。而在眾多清代文人文集當中，又有兩部作品是金毓黻特別關注的。

第一是李慈銘。不論是在仕宦還是治學期間，《越縵堂日記》與李慈銘的詩文作品一直是金毓黻閱讀的重心。金毓黻對於李慈銘有如此愛好，首先顯現在他寫作日記的動

¹⁰⁰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41。

¹⁰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270。

機中：

…會稽李莖客先生《越縵堂日記》，不拘此例，匪惟談理論學之語，層見迭出，即所作詩文，亦悉以入錄，作日記讀可，作全集讀亦可。吾人於此一書中，可即出詩集、文集、經說、雜著多種，而先生以精神面貌，學修德業，胥可於此一編中窺見之，此法又勝於顧、曾二氏矣。余自讀李氏日記有所觸發，復續前業，其後此每日必有所記，毋潦草自欺，毋作輟無恆，而其體例一依李氏，庶幾為進德修業之一助耳。…¹⁰²

這段文字說明了金毓黻對於李慈銘的日記中「綜合記述」的認同。當然，如顧炎武《日知錄》的學習札記，曾國藩日記的每日記事並非不妥，但過於單一，略顯枯燥。金毓黻對於李慈銘的作品有長時間的閱讀，除了個人精神上的嚮往外，也是生活寫作中重要的參照。

第二是錢大昕，金毓黻對於錢大昕長時間的閱讀，其著作如《潛研堂集》、《十架齋養心錄》、《恆言錄》等，而金毓黻對於錢大昕的評價在史學研究上，清代考據學者，如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等人，都是以研究音訓小學、經學而聞名，對於史書的考訂較為稀少，而錢大昕與全祖望，則精工於史書考證，並且對於輿地、金石等學問也相當專精。¹⁰³而同樣工於史書考據的趙翼，金毓黻則認為，《廿二史札記》的成就，在考據學的範疇上便遜色於《廿二史考異》¹⁰⁴。在這方面也可看到金毓黻的考據學認知與傾向。而綜觀金毓黻在文集閱讀的取向上，筆者將其分為三個重點：史事、史實的搜尋與考察；學術與精神修為的探索；文藝評論與參考。

其次是「史籍」。雖然如前段所述，金毓黻認為史籍無所不包，然而某些作品還是被特別歸納到他所認定的「史籍」之中。金毓黻特別指出的這些史籍，有以下特色：一是資料性的，以地理書、地方志為主。如《讀史方輿紀要》、《歷代輿圖》、《吉林通志》、《盛京通志》……等作品；二是通史性的，這類作品的性質較為特殊，包含傳統通史以及近代學者所編著各類文化史著作。傳統通史主要指「長時間記錄」的作品，如日記

¹⁰²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

¹⁰³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324。

¹⁰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350。

首篇出現的《史記》，金毓黻在日後閱讀的《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通志》等書；而近代學者所著作的通史，如柳詒徵、陸懋德、呂思勉等人所著的《中國史》、《中國文化史》等，這類的作品，則帶有「教材性質」。通史的閱讀帶有某種方法的觀察，同時也可能受到民初新史學的風潮中，對於通史寫作提倡而有所關注。至此可以看到，在金毓黻早年的閱讀取徑上，文史冶於一爐，但其閱讀取徑上帶著某種「工具性」。這一種工具性的閱讀，如前文「六經皆史」的觀點，是將各類書籍都視為歷史文獻來處理，以作為各類史事敘述的支撐與證明。

金毓黻對於文集史籍的廣泛閱讀，在 1925 年末發生轉折。在白永貞的邀請，以及自身長期閱讀的整理下，他開始著手東北史地的研究，首要的工作有兩個，一為白永貞所邀請編寫的《奉天通志》，一為其本身著手編輯的《遼東文獻徵略》。至此，金毓黻對於文史一類書籍的閱讀，開始集中於東北史事方面的搜尋。除了前文所述的地方志，另有如《八旗通志》、《遼東志》等；另外還增加了文人遊歷東北地區的筆記，如《嘯亭雜錄》、《熙朝雅頌集》、《扈從東巡日錄》……等，對於這些有關東北地區的文人文集，金毓黻更指出：「余謂今人競言愛國，不知愛國須自愛鄉始，又競言保存國粹，不知保存國粹須自刊刻先正遺著始。」¹⁰⁵此言強烈的反映了他的地方史觀點，也說明了他的史學治學途徑。

也是在這個時期，金毓黻接觸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的翻譯本，與《滿州發達史》原書，對於稻葉君山的研究，金毓黻的評價為：

…(清朝全史)為日人稻葉君山氏原著，譯者謂著者覃思十餘載，取材於官私文書東西載記凡數百種，用力之勤，差與柯氏劭恣相比，雖以異國人述吾國史，或有失實之處，其持論亦不免逞臆武斷之失…。所論皆具特識，則稻葉氏優於史才，不同泛衍之作可知矣。…¹⁰⁶

…(清朝全史)惟著者之取材不僅得之於遊歷，其所引用之書籍，為吾國人尚未寓目者不啻數十種之多。如日本傳抄本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也，《全遼志》也，朝鮮人所著之古史之冊檔也，皆足令人驚異。吾國通博之士匪少，以言

¹⁰⁵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485。

¹⁰⁶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431-1432。

清史，乃不如稻葉創獲之多，視之洵有愧色矣。…¹⁰⁷

稻葉君山對文獻運用的豐富性，令金毓黻感到佩服，這也與其治學取向，強調文獻的重要性有關。同時金毓黻也借用了《滿州發達史》為工具，考察東北相關史事。日後更將該書譯為中文，作為東北史地研究的參考書籍。¹⁰⁸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在東北的金毓黻幸未遭到迫害，但也受到日軍一段時間的軟禁。其後金毓黻在滿洲國從事學術服務，依舊維持東北史地的研究，不過這時金毓黻對於東北史地的視角，從過往的地方性書籍，擴大成兩個層面：其一為「渤海國」史相關，渤海國的研究在金毓黻所言，是早年與黃侃對談時，一直希望可以著手進行的研究，而從日記的閱讀紀錄之中筆者推測，金毓黻也有可能受到日本學者鳥山喜一《渤海史考》的激發，開啓其渤海史研究。不過中國在早期對於渤海國的記載相當零星，近代對於渤海史的研究尚屬稀少，金毓黻對於渤海史相關史籍的閱讀外，重新編輯出中國方面的渤海史志，毋寧說是更主要的目的；¹⁰⁹其二是中國朝代中，自東北發跡的政權，遼、金、元各朝的相關史書，如《大元一統志》、《契丹國志》……等，這一研究的改變，和過往金毓黻以地方志、地方文人為中心的治學觀點相比，有相當巨大的變化，在這樣的視角下，過往金毓黻所言，治東北史地的「愛鄉」情懷，籠罩了一層「中央性」、「國家性」的色彩。另外在金毓黻於滿洲國服務時，因職務關係而前往日、韓兩地搜尋相關東北史地文獻時，也是集中在這兩方面的資料搜尋上。¹¹⁰而這一時期金毓黻的閱讀，多帶有學術工作的性質，從日記裡面可以發現，金毓黻對於許多書籍，都以「校」、「考」的態度來面對，這點反應了金毓黻的小學治學經驗，同時也成為其日後對於東北史地研究的主要取徑。而這樣的學術型態，在1936年金毓黻抵達四川任教之後，也持續維繫在日後的學術研究工作上。

第三節 金毓黻對當代學術的回應

¹⁰⁷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1778。

¹⁰⁸ 《滿州發達史》中譯本在日後也有出版，然出版資料不詳，若從稻葉氏「漢譯滿州發達史序」文中，只可得知該書於1940年出版。

¹⁰⁹ 關於金毓黻的渤海史研究，於次章有主要討論，在此先不做贅述。

¹¹⁰ 關於金毓黻至日、韓兩地搜尋史料的細節，可參見梁啟政〈金毓黻三次域外訪書述評〉，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二文。

在前一節所呈現金毓黻的治學歷程與閱讀類型，顯示金毓黻似乎是一個傳統學術路徑的學人，以文獻與考據為主。然而金毓黻書寫日記的同時，也是中國學界對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學術兩者取捨、論辯的時期，雖然身處在這一辯論的風暴圈之外，金毓黻對於這樣的現象，做了這樣的回應：

近日新學舊學之爭頗烈，各執一詞，言皆成理。余為此至易決，新者對舊而言，然無舊絕不能生新，言新則包舊矣。舊之生新，如木之結實，種實而新木又生；又如人之生子，得子則嗣續勿替。¹¹¹

新學與舊學在金毓黻看來，是互為因果的產物，孰高孰低，不可斷然言之。實際上當金毓黻接觸到新學與舊學激盪下的產物時，這樣的原則也並無改變：

…由圖書館借到新出版書數種，擬分類讀之。一、科學方法論；二、文學概論；三、國語文法；四、文字學；五、史學。近日學術界革新事業方法有二：一曰整理國故，一曰迎受新潮。新潮之輸入者，已具有條理，自無整理可言。至言整理國故，則多主用科學方法。胡適中國哲學史之著，其見端也。然科學方法之何若，為研究學術之階梯，引為先務，職是故耳。…¹¹²

因此，新舊之爭，只是方法取徑的問題，而方法的使用只是治學的基礎。而對金毓黻來說，新法與舊法各有所長，不可偏廢。以中國近代進行知識分類一事為例：

…晚至圖書館，見姬君金聲，言及京師圖書館藏書豐富，善本之多，為藝苑之巨觀，使人聞而生羨，惜於未及親歷其地而飽觀之也。姬金聲告余：近人講目錄學者，主張有二：一主用舊日四部分目，一主用杜威十類，皆對於吾國舊籍之主張也。余為杜威十類，係科學分目，適合學理，其法極當。第吾國舊籍，自劉歆《七略》、阮孝緒《七錄》以後，皆以四部，千年專用而罔改。舊中以叢書一類，尤為難理，有數百人之著作合刊一編者，有一人自著若干種合刊一編者。若以科學分類，則一種叢書可跨數科，入此則失彼矣，無已則別立叢書一類，亦與四部舊法不合。依余主張，整理舊籍，宜新舊兩法參用。一用新法以科學分類，按各籍之性質，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一用舊法，別立叢書一類，分數人合刊、一人自

¹¹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41。

¹¹²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106。

著兩門，一切叢書皆為列入。...¹¹³

對金毓黻而言，所謂新舊之爭在中國當代學術發展的真正盲點，有一項歷史性的源流，他以個人經驗提到：「…余從事學問以來，積生二弊：貪多務博，一弊也；作輟無常，二弊也。物博之弊，為吾國學者通病，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古訓昭然，奉為科律，終乃至於不一事不知，無一事真知，學術不進，此之故也。…」¹¹⁴這樣的說詞，反映了中國在近代學術的改變中，學人需要有一個「專門性」的發展，才能有所突破，並非拘泥於新法與舊法的差異性。

而在零星的紀錄之中，金毓黻對於中國學術界當代的一些問題，在日記中另有三篇專門文章做為回應，分別為《去蔽》、《學術論》與《釋爭》。

《去蔽》一文寫於 1920 年 9 月 27 日。所謂的「蔽」，是金毓黻對於學人學習中，必然產生的「盲點」，而有所感懷。盲點的產生原因有很多，然而金毓黻認為現今的學術盲點，往往關係到個人利益，特別是「今世學人之爭，主用語者，曰文可廢。主用文者，亦曰語無當。」¹¹⁵在個人利益的堅持下所推展的學術觀點，其明確性與客觀性就會受到質疑，尤其「其為是為非者，一朝聽聞，猝加判定，合於己見，則從而是之，乖於己見，則從而非之。」更是危險，也因此金毓黻提出「人惟多讀書，多求師，始能識所蔽，觸己見。己見不存，蔽斯去矣」。¹¹⁶

如果說盲點的產生是無可避免的，要突破盲點，首先需要理解盲點，理解盲點，勤學求師是必須的方法。實際的方法操作上，又可分為兩點，分別為「考慮」與「徵驗」。而進行驗證的過程又分三階段：設論、學說、定理。唯有經過審慎的思考，除了避免學術盲點的產生，也能夠創造出更精實的理論。金毓黻對於這樣的過程如此比喻：「吾人之去蔽也，如剝筍然，剝去一層，又有一層。如抽蕉然，抽去一絲，又見一絲。然剝後之筍，非復向日之筍，抽後之蕉，亦非向日之蕉。」¹¹⁷從這樣的觀點可以看到幾個論點：就學術的方法上，金毓黻透過「演繹」來進行學術論證，然而演繹的邏輯是中國精神修

¹¹³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03-104。

¹¹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06。

¹¹⁵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25。

¹¹⁶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25。

¹¹⁷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262。

爲的一項傳統，金毓黻在這邊將其目的與現代學術間接做了結合；而學術論證的過程，除了解答問題之外，還有深化問題的意涵。

其次爲《學術論》，《學術論》一文是金毓黻的一個寫作計畫，成文於 1921 年 2 月 28 日，該文有另一個名稱爲《並行與調和》，是其對於現今學術界的論辯現象做出的回應。本文雖然沒有定文，但其中的大綱也反映了金毓黻對於當代學術界的觀點。在金毓黻看來，當代的中國學術界所存在的眾多學說，新學舊說皆有，然而學人在「並行」與「調和」的態度上，卻是「並行者，各自獨立而不相犯；調和者，去其異而擴其同」，例如康有爲談《孔子改制考》，與西方君主立憲制相提並論，雖言調和，實爲附會；而各家學說在各自獨立之中，又相互的攻擊，這些對學術界的發展都不是良性的。金毓黻認爲，所謂學術的並行與調和，是如同父母生子一般，小孩來自於父母親，但是三人又各爲獨立的個體，實際的例子，以「遠西文學派別，有浪漫、自然兩派之分，迨兩派爲人所厭，復有新浪漫主義發生，與前此浪漫主義全非」。而在學術發展的並行與調和之中，最後符合於時代者，便會成爲真理。¹¹⁸但這並非要人們去服膺於時代而選擇學術的取向，金毓黻最後指出，如果一個人沒有學術的主見「否則愉悅游移，不下己見，出以模稜兩可，雖能成名，上之不過如梁任公，下之亦僅爲張東蓀，勞瘁畢生，終爲稗販，終無所得，真可笑也」¹¹⁹。《學術論》的觀點與《去蔽》類似，皆談及現代的學術突破，然而《學術論》的論點，又近似於西方「辯證法」的邏輯，有學說與時代相互影響的變化性，這一觀點的產生又顯現出金毓黻對於現代學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最後一篇文章爲《釋爭》，成書於 1922 年 12 月 1 日，而最後的定稿於 1924 年，這篇長文的大意是：金毓黻將「爭」的性質，區分爲「君子之爭」與「小人之爭」，兩者分別聚焦於「是非」與「利害」。君子之爭是對於知識的探求，而小人之爭則在於利益的爭奪，小人爲了利益，進而混淆視聽、指鹿爲馬，甚至利用君子之間對於學問是非的爭論，趁隙而起，進而將災禍推諉於君子，史事所載的朋黨之爭，即是一項。因此君子之爭，便不應該有利益的糾葛，才不會造成災禍¹²⁰。然而，小人之間相爭於利害，得利

¹¹⁸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263。

¹¹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263。

¹²⁰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727-728。

失利的情況很容易分野，君子之間對於學問是非的討論，卻往往不容易得到明確的答案，在於學人之間因為所學不同，往往容易堅持己見，進而對於他者的論點排斥、詆毀，使得學術間的討論走調失真。金毓黻認為，在學術的討論上，堅持己見是一種弊病，學者問學，應該虛心受教，廣納他人意見，才能讓學術真理更加發明¹²¹。

除了個人對於時代問題的回應，金毓黻也對於代表新學術文化的引介者：梁啟超與胡適進行了評論。金毓黻之所以選擇這兩位，在於「梁任公、胡適之皆精於舊學者也，故喜言新學，粗知其門徑，而不能精到及一言」¹²²，這段發言顯示金毓黻對於「專精」的強調，因此對於胡、梁推行新法頗不以為意。其中對於胡適，金毓黻有這樣的回應：

…看《大學月刊》胡適之論清代漢學家之科學方法。科學方法有二：一曰演繹，二曰歸納，用此方法，範圍一切，可以整理故訓，可以發明真理，此其所長也。然亦有所蔽，夫一役於物，而不知於物之外尚有事在，此西洋學術之唯心學派所復熾也。吾國程朱學派，主即物窮理，近於唯物，主心不役物，又近於唯心，專於唯物者固未必是，而偏於唯心者亦未必非。胡氏承其家學，頗右漢而左宋，余不然之…¹²³

胡適過度的強調方法，在金毓黻看來有本末倒置的狀況，而且對於各家方法屬性的一分為二，就失去學術的客觀性。對於胡適所言：「只有真提高，才有真普及，提得愈高，及得愈普」所進行的知識推廣，他認為這樣的方法對學術的幫助效益不大，學術本身還是有某一方面的專門性，而只有保持這樣的專門性，才能維繫學術對於真理探求的目的。¹²⁴

而關於梁啟超，金毓黻在初期有一段對於梁啟超在整理清代學術之後的一小段譏諷：

…梁氏論有清一代學術，以蛻分期之代表人物為康南海及其自身。康氏則然矣，而梁氏則不免失之誇大。依梁氏之意，以謂有清一代學術界之變遷，已實有革故鼎新之功，此則誠然，惟茲論者，為蛻分期，為今文學家，為有清學術，非以語

¹²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730。

¹²²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677。

¹²³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66。

¹²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34。

論政治也。且於此時，有王壬秋為今文大師何以不舉，而獨於己津津樂道之，詎不懼識者之笑其誕妄也？末並云：「續悉諸胡之後有胡適者，頗能守清儒治學方法，儼然正統派之碩果。」此又塗附胡氏以增壯，益徵其牽引比附，無當於事實矣。梁氏之論有極是者，如云：「俞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然以好談政治，稍荒厥業。」章氏於近七、八年確是好談政治，余嘗謂章氏若移其談政治者壹意談學，則其所獲及所著書必有遠勝于今日者。縱令章氏此後復能談學，亦不過講內典、作禪語耳，必不似舊日專談經、史、小學之作，人人可讀，易於捉摸，蓋可知也。故梁氏斯言，真知言也。但梁氏亦智過其師，以好談政治稍荒厥業，知人之失而不知自鑑，所謂目察千里而不見眉睫者也。…¹²⁵

金毓黻本身早年的閱讀也是以清人文集為主，因此對於梁啓超自命為清代學術的結論性人物，不甚認同，加上梁啓超在政界流轉多年，和金毓黻對於學術要求客觀的認識，有所出入，可能因而出此議論。不過特殊的是，金毓黻對於梁啓超雖然有這樣的嘲諷，梁氏著作在金毓黻日後的閱讀卻有不小的比例，諸如《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著作，對於梁啓超所提出史學觀點，深表贊同，甚至在日後，約略影響了金毓黻的史學研究。¹²⁶

從以上的幾篇回應可以發現，金毓黻對於當代學術問題的討論，並非以新舊方法的內容、性質來討論，多半會回歸某個起點，來討論學術存在的核心，更甚者，是對於所謂的「學術討論」，提出某些利益取向的質疑，而這樣的利益取向，又影響到某些「人格」的塑造。筆者認為，金毓黻在另一個角度上，堅持了學術的「中立性」，也提出了學術的「道德性」。而金毓黻對於新舊學術的「調和」，也是他在新舊學術討論的過程中，展現出的主要態度。

第四節 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形成

要總結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形成，主要可以從兩個方向著手，第一是金毓黻的早年承學。從金氏的學習簡歷之中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其一，金毓黻在東北的初階段學習，分

¹²⁵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200—201。

¹²⁶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258、1268。而關於梁啓超對於金毓黻的影響，可參看本文第四章「金毓黻之史學史研究」。

別經歷過私塾以及現代學堂的過程。然而受到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得知當時確切的學習內容，透過現代研究的週邊成果顯示，筆者推測，這樣的學習歷程同時帶有中國傳統的蒙學教育，以及現代新式新民教育的氛圍，於是乎，新與舊的文化在此同時呈現，也同時影響金毓黻的知識觀。¹²⁷其二，在金毓黻中學堂畢業之後，考入北大，而在 1913 年間的北大文科學風，在章太炎的學生的影響下，以考據、小學為治學途徑，金毓黻在北大主要的學習對象，即是兩位「太炎門生」。¹²⁸而在金毓黻的日記之中，對於章太炎多以「世師」稱之；而在金毓黻晚年有一詩作對於黃侃的緬懷：「廿七登上庠，人海紛相逐。廿八逢大師，蘄春來黃叔。授我治學法，蒼籀許鄭優。研史應先三，窮經勿遺六。文章重晉宋，清剛寄縟鬱。」這一詩作也反映了金毓黻對自己學術基礎的定位，是以小學的傳統著手。然而這樣的承學背景，只是說明金毓黻在學術訓練上廣義的基礎，這樣的訓練單指其史學思想的形成，太過牽強。筆者認為，金毓黻「正式」史學思想的形成，是在其著手研究東北史地之後才有明確的定位。

1925 年金毓黻在當時新學堂恩師白永貞的邀請下，著手編寫《奉天通志》，在這一機緣下，金毓黻於同一時間也進行了《遼東文獻徵略》的編著。1926 年 10 月 13 日，金毓黻編寫了一篇演講稿，說明其著手研究東北史地文獻的原因。該講稿的重點有二，金毓黻認為研究東北史地文獻的重要性，在於「愛鄉」與「證史」。這兩個主題可說是應對傳統「中原中心」歷史觀的感性與理性層面，感性層面而言，是希望透過故土的研究，或文獻徵集，或史事整理，來建立人與地更深刻的連結。¹²⁹理性層面而言，則是對於傳統中原史書在提及東北地區時，或語焉不詳，或多有臆測與訛誤，金毓黻認為，透過今日東北學人對於東北史地的親身調查，可以校正、映證傳統史書在東北史地方面寫作的缺失，也有助於補充傳統史書在東北史地書寫的不足之處。¹³⁰而研究東北史地與東北文獻的方法，金毓黻歸納為三類：「分類」、「博考」、「求真」。實際的操作上也如同金

¹²⁷ 對於中國近代新式中、小學堂的設立目標、課程規劃，以及實際運作概況，可參見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出版，1999。

¹²⁸ 關於 1920 年以前北京大學文科學部的發展及太炎門生在北大的影響力，可參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一書(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0)，頁 25-37。

¹²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761-1762。

¹³⁰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762-1763。

毓黻命名，第一步需要對文獻分門別類，以便於接續對材料真、偽、信、妄的檢證；¹³¹其次透過文獻所反映的各項史事，多方考察，或對於各項文獻所聚焦的某項史事，集中討論；¹³²如此反覆的印證，以達到對史事理解的精確性。

而金毓黻這樣的史學觀點，最初是集中於「刊刻先正遺著」。然而九一八事變後，金毓黻的東北史研究視角發生了變化，即前文所述，蒙上「國家性」、「中央性」的東北史地研究色彩。這種史學視角的擴大，除了觸及到日本方面的研究之外，筆者猜測，和九一八事變下，日本對於東北地方某些不人道的對待，激起金毓黻的國家與民族意識。實際的例證在金毓黻 1937 年所著「瀋陽蒙難記」一文文末，今是數度提及「爾時余忝地方監司之任，當資非常巨變，理應以死報國」；「雖然於罹難之日不能以死報國，而欲委曲求全，終覺外慚清議，內咎神明」等文，¹³³似乎真有國難當前，士子當殉國以明志，然而金毓黻無法因此動作，只好將學術的視角，轉向更為宏觀的視野，作為報國的投射。

簡略歸納金毓黻的治學取徑。可以看到，金毓黻最初的治學面貌，是從傳統文、史學的範疇出發，進而在這個傳統下開展其東北史地的研究，不過金毓黻的視角首先帶有地方性，以一些地區性的文集、史料為主要切入點；而在九一八之後，因為與日本學界的接觸，加上金毓黻對於滿洲國政權的排斥，其視角上升到了「國」的範疇。而在此之後，金毓黻的研究方法與路徑，大致定型。

¹³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763-1764。

¹³²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764。

¹³³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2660。

第二章 金毓黻之東北史研究

東北史研究在金毓黻的學術生涯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若論其治學緣由，地緣的認同是最主要的因素。本章目的在於藉由金毓黻東北史地研究的特性，探討金毓黻史學研究的特色，並對比金毓黻過往學術訓練的背景。本章首先對於中國近代在東北史地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上作一簡介，並且說明金毓黻早年的東北史地研究重心，接續以氏作《東北通史》為中心，說明全書精要，並指出該書史學方法之特色，藉以說明金毓黻在其中所展現的史學思想。

第一節 中國近代東北史研究的基礎

進入金毓黻東北史研究的領域之前，首先說明近代中國在「東北史地」研究上，如何起步與發展。「東北史地研究」是中國較為晚近產生的學科，而這項學科的產生，就學術史的延續而言，和清嘉道以來開展的「西北史地研究」，同屬於中國近代邊疆史地研究的環節，然而以現代研究的觀點來看，在研究成果上並無西北史地豐碩。¹³⁴不過中國的東北史地卻有長久的「歷史書寫」傳統。

這個傳統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其一，是「朝代史」的修纂。即在中國歷史中，以東北的地理疆域為根據地所建立的政權，所書寫的正史類書籍，如《遼史》、《金史》，甚至遠在周代，史記亦有〈燕世家〉的篇章。個人對於東北的書寫也會以朝代為主題，如明代學人楊循吉(1456-1544)《遼小史》、《金小史》等作品。其二，是「官書」的書寫，相對於朝代史的正史書寫，官書指的是存在於東北的政權，但並非中原所認同的「正統」政權，這些政權所留下來的歷史書籍，在傳統分類上，也歸類為「雜史」、「別史」等，最有名者為唐中葉時，「渤海國」的相關紀錄，如舊唐書〈渤海靺鞨傳〉、新唐書〈渤海傳〉、晚清學人唐晏(1857-1920)《渤海國志》等，而宋代學者葉隆禮《契丹國志》，也是屬於「官書」之類。其三，是地方志的編修。清代建國後，因為源出於東北地區，因此

¹³⁴ 對於西北史地與中國邊疆史志的學術發展，諸多近代史學史教科書、研究書籍均有介紹，筆者在此不多贅述。詳細的流變，早期的著作可參考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1974)，導言一章，頁 1-26。近年則有彭明輝，《晚清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2002)，第二章〈從元史研究到邊疆史地〉，頁 27-61。

禁止人民前往東北開墾，直到乾嘉以後才開始進行移民實邊的政策，¹³⁵在東北地區也有各個地方志的寫作。如《吉林通志》、《長春廳志》、《奉化縣志》等，且東北地區的方志書寫，到民國初年仍在進行。

其它關於中國傳統對於東北地區的歷史書寫類型，尚有個人的旅行紀錄，如宋代洪皓(1088—1155)《松漠紀聞》，清代楊賓(1650—1720)《柳邊紀略》；以及傳統地理書，如《大元一統志》、《大清一統志》、《全遼志》；另外社會經濟發展的相關介紹，則可從典制類書籍，如《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大金集禮》等書籍中觀察到。¹³⁶

而近代對於中國東北方面研究用心甚深者，首推日本學界的研究。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接管東北以來，日本對於東北的調查與歷史書寫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關於日本在東北的研究，可分成三方面，其一為「調查報告」：在日俄戰爭後，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與關東廳管理東北，在日本經營東北的過程中，對東北進行了多種調查，如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所刊行的《南滿州經濟調查資料》與《北滿州經濟調查資料》。¹³⁷關東廳與日本軍部則編寫了東北地區地理書籍，如守田利遠所編著《滿州地誌》、關東都督府所編著《滿州志》等，另外尚有一系列東北現代地圖繪測。¹³⁸除上述單位之外，1920年成立的「滿蒙文化協會」在日後也與滿鐵方面合作，調查中俄邊境相關地理、氣候、水文、產物……等，屬於綜合性的地理調查，並編有《露西亞經濟調查叢書》。¹³⁹大量的調查報告也成為中、日學界日後研究東北史地的重要基礎材料。

其二為「東北近代外交史」，這一主題與日本對中國的東北政策有關：透過將東北作為一個「獨立的區塊」，以疏遠東北與中國的連帶。在討論東北與周邊政權的關係上，分別以朝鮮與俄國為主。東北與朝鮮方面的外交問題，從「間島」的所有權出發，相關作品如小藤文治郎《韓滿邊境歷史》、幣原坦(1870—1953)《間島國境問題》，以及內藤湖南(1866—1934)《間島問題調查書》三著作；與俄國方面則討論中俄過往所簽訂的各

¹³⁵ 關於清代對於東北地區「移民實邊」政策的討論，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有詳盡的介紹，台北，國立政大歷史學系出版，2001。

¹³⁶ 以上典籍的分類與蒐集，詳細類目可參見青木富太郎等輯 劉選民校補〈東北史地參攷文獻摘目〉，頁257-297，收自《禹貢》6：3-4(1936)。或金毓黻所編著《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

¹³⁷ 馮家昇，〈日人對於我國東北的研究近狀〉，頁3。

¹³⁸ 馮家昇，〈日人對於我國東北的研究近狀〉，頁2。其中列舉太田喜久雄等人所編著《中華民國及滿州國疆域圖繪製過程》，共有15項東北現代地圖。

¹³⁹ 馮家昇，〈日人對於我國東北的研究近狀〉，頁4。

項條約，以及領土所有權，如矢野仁一(1872—1970)《松花江之航行權》、石田幹之助(1891—1974)《中俄關係之第一期》、宮崎正義(1893—1954)《近代中俄關係之研究》……等，其後，矢野仁一更擴大東北外交相關研究，討論「三國干涉還遼」的問題。¹⁴⁰

其三為「清史研究」，可分為清人「入關前」與「入關後」兩方面。關於清人入關前的研究，內藤湖南不少作品，如《清朝開國史料》、《清朝姓氏考》、《清朝初期之後嗣問題》等作，¹⁴¹接續內藤湖南的研究，有稻葉君山(1876—1940)與鴛淵一(1896—1983)。稻葉君山著有《光海君時代之滿鮮關係》、《朝鮮孝宗朝兩次之出兵滿洲》、《皇清開國方略之曲筆》、《清初之疆域》、《塗改本清太祖實錄殘卷及其年代》等著作；¹⁴²鴛淵一則有《清初清韓關係與三田度之碑文》、《遼陽喇嗎墳碑文之解說》等作。¹⁴³而稻葉君山在日後更有《清朝全史》與《滿洲發達史》二著，對於東北的歷史有更長的時序考察。¹⁴⁴可以看到，日本方面對於東北史地的研究，不論在主題和書寫面向上，都較中國多元且豐厚。而將東北視為一「獨立的區域」，則是出於戰略考量，也因此，激起中國方面積極治理東北史的一股力量。

再由前文可發現，傳統上對於東北史地屬於「研究」性質的書籍則較少，多半屬於「紀錄」性質的史書。在民國以前，帶有研究與調查性質的東北史地著作，以曹廷杰(1850—1926)所著《東三省輿地圖說》、《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亞東偏紀要》三書為主。進入民國之後，對於邊疆史地的研究一度停止，直到1930年代又重新展開，開展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在於日本在東北積極的經營考察及其戰略目的，而激起中國學人產生與之對抗之心。這樣的出發點，和清末邊疆史地的研究的興起，不謀而合。

近代中國對於東北史地的研究上，以1931年由譚其驥(1911—1992)、顧頡剛(1893—1980)等人成立的禹貢學會為主要研究中心，該會設有《禹貢》半月刊，於1934年發刊，禹貢學會最初以古代沿革地理相關研究為主，日後進一步推廣到邊疆史地研究方面。《禹貢》也先後出版許多研究專號，諸如河套地區、西藏、回族研究等，其中也

¹⁴⁰ 百瀨弘著 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頁114-115。

¹⁴¹ 百瀨弘著 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頁115。

¹⁴² 百瀨弘著 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頁116。

¹⁴³ 百瀨弘著 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頁116。

¹⁴⁴ 百瀨弘著 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頁116。

包含「西北史研究專號」與「東北史研究專號」。對於東北史地研究方面，以馮家昇貢獻甚多，除了本身的研究，如對於周、秦、漢、魏間，東北地區的民族、社會、文化等研究外，也介紹海內外相關研究成果，¹⁴⁵而在 1936 年的「東北史研究專號」，更集中介紹了海內外與東北史地研究有關的文獻、期刊資訊、圖書目錄等，對於現今或是當時研究東北史地者，提供了完善的資訊。¹⁴⁶除了禹貢學會對邊疆史地研究的推動外，民國以來相關研究，另有張其昀在 1931 年 6 月至 8 月的考察，考察成果分別有〈東三省之考察〉、〈東北之氣候〉、〈東北之黃渤二海〉等講稿發布。¹⁴⁷

第二節 金毓黻初期的東北史研究

相較於近代開展的東北史地研究，金毓黻算是提早進入這樣的領域。前文所述的東北史地研究，多以「學術研究」的形態出現，及現代學術報告的寫作為主；而金毓黻在 1925 至 1936 年間，關於東北史地的研究著作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方志性質的書寫，如《奉天通志》、《渤海國志長編》、《長春縣志》等書。關於方志的寫作，金毓黻在接洽到《奉天通志》的編輯邀請後，特致函友人，說明他對於方志的相關概念。金毓黻認為，方志的編修可分為狹義與廣義，狹義的「方志」，是作為地理性的書籍，因此對於地方邊界、山川、物產等自然現象，需要詳加記載，至於牽涉到人文社會的主題，如人物、藝文等，就在地理說明的行文中連帶介紹；而廣義的「志書」，就不只是自然地理的介紹，舉凡與地方相關的文獻，都應該列入修纂的目標，因此也就包含如傳統史書的表、書、紀、傳等主題，而這點也是傳統方志的書寫特色。對金毓黻而言，他所期待的方志編寫，是以後者為主，尤其近代社會有許多不同於古代鄉鎮的發展，更應該列入方志的記錄範圍。而編寫方志的方法主要分成「蒐集文獻」與「資料編輯」兩階段。金毓黻說明，在方志的文獻採集中，對於古代史事需要「博考舊籍」，對於近現代的事件則需要「實地徵訪」。兩者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對於史事記錄的精確，避免有虛構、訛誤的問題。確立資料的可信度後，再透過分類、編輯，最

¹⁴⁵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1995)，頁 184-185。

¹⁴⁶ 參見陳鴻舜〈東北期刊目錄〉，頁 203-231。陳鴻舜〈東北書目之書目〉，頁 233-255。青木富太郎等輯劉選民校補〈東北史地參攷文獻摘目〉，頁 257-297。以上文章收自《禹貢》第六卷第三、四合期，1936。

¹⁴⁷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頁 315-316。

後定稿出版。依循著這樣的邏輯，編寫《奉天通志》時，金毓黻便負責〈山川志〉、〈藝文志〉與部分的〈禮儀志〉內容，也體現他所說的廣義與狹義方志的內容。¹⁴⁸《長春縣志》則是金毓黻在 1929 年接續進行編修，金毓黻在之中也負責〈輿地志〉與〈人文志〉的編纂，一如前文所言，金毓黻在編輯的過程中蒐羅了大量古代史籍的資料，同時對於各篇史料有詳細的考證，也展現了他的小學學術訓練。不過近代對於《長春縣志》一書有一些檢討：主要由於本書的編輯群易手多人，金毓黻是最後一個接下編輯職務者，因此各篇章之間有良莠不齊的現象，而金毓黻對古今史事分別要求的考證方法，也並未在各篇章中有平衡的展現，另外一些主題的分類，也有待商榷，是現在參考該書需要注意的。¹⁴⁹

《渤海國志長編》是金毓黻仿照傳統史書體例，對於帝王、臣子人物、時間軸與世系、典章制度與地理環境，按照紀、傳、表、考等類別進行書寫。該書於 1934 年出版，卷首「總略」，簡略說明成書目的與渤海史地發展概況，¹⁵⁰卷末的餘錄與文徵，則列舉本書書寫的徵引文獻，補充說明正文主題不足之處，以及對於渤海史地可以延伸討論的問題。¹⁵¹正文修成後一年，金毓黻又增加了「補編」一卷，包含索引、目錄等章節，¹⁵²可以看到金毓黻在修纂本書時，除了依循傳統史籍體例，還加入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可說是將新史法與舊史體冶為一爐。而本書也是中國現代渤海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參考書目之一。

第二類是文獻的徵集整理，如《遼東文獻徵略》、《遼海叢書》、《東北文獻零拾》、《東北古印鈎沉》等書。《遼東文獻徵略》是金毓黻首部類似札記的東北史地研究，自 1924 年提出編輯計畫，1927 年編輯完成付梓出版，內容凡分郡邑、山川、金石、人物、典籍、雜錄……等共八卷，其中對於地理和人物方面有相當精細的考證，金毓黻的友人在閱讀本書之後，也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稱其「作者虛心不為武斷之論，又富於參攷書，引用

¹⁴⁸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346-1347。

¹⁴⁹ 曹殿學主編，《吉林方志大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頁 178-181。

¹⁵⁰ 金毓黻著，《渤海國志長編》，台北：華文書局印行，1968，遼陽金毓黻千華山館刊本影印。見原書頁 11-251。

¹⁵¹ 金毓黻著，《渤海國志長編》，頁 795-1064。

¹⁵² 金毓黻著，《渤海國志長編》，頁 1065-1302。

古籍頗多罕見之本，人所不經意處，每能抽引端緒，得極有關繫之佐證」。¹⁵³而授業金毓黻的黃侃，在閱讀本書之後，則給予正反兩面的評論：

…略觀尊者，翔實謹嚴，非僅區區方志之比，體雖劄記，時以條貫秩然。至美遼東風俗，而引《漢志》之言，述僑寓先賢，獨遺北海逢氏，此為小小罅漏，蓋宜補苴。若鄭孝胥輩惡詩，本不足引為詬恥，鄉曲鄙生之言，乃可以塵穢簡牘乎？吾聞圖欲藏書，悶在巖穴，絲絲千歲，復見金生，斯乃東序之祕寶，匪獨渤海之駿雄也。…¹⁵⁴

接續《遼東文獻徵略》之後，金毓黻在滿洲國任職時期，出版了巨作《遼海叢書》。該書的編纂自 1925 年起，原定名為《遼東叢書》，1927 年後擴充內容，又改名為《東北叢書》，在 1929 年到 1934 年間，金毓黻召集眾人，多方籌款、編纂，最後出版該叢籍，並定名為《遼海叢書》。金毓黻也為本叢書撰一提要，刊載於《禹貢》雜誌上。全書共十集，蒐羅遼東鄉邦先正遺著，以及時年日本以內藤湖南為主編的《滿蒙叢書》中未搜羅的史籍，分為專著、雜誌、文徵、存目四大類。也是因為這部書的編輯，金毓黻認識了當時日本的「滿蒙學者」，也借此前往日韓兩地蒐羅史書，本叢書除傳統史籍外，也輯入許多絕版或未刊刻的史料，是東北史地研究中重要的一手史料來源。¹⁵⁵《東北文獻零拾》則是金毓黻於四川任職時，對當時東北大學所蒐羅的東北文獻進行整理，依性質分為典籍、名賢、郡邑山川、古蹟、雜錄五類，¹⁵⁶特別要注意的是雜錄類中，加入了日本學界《東洋文庫》叢書，以及稻葉君山的相關著作。¹⁵⁷為避免重覆，若有與《遼東文獻徵略》相同者則不在記述，可以說是前述兩者的補充說明。而《東北古印鈎沉》可說是金毓黻學術的一項特色，在金毓黻的日記之中，對於「古印信」有長期的蒐集。對金毓黻而言，印信在東北史地研究上，包含了金石器物(印信材質)、職官志(印文官名)、

¹⁵³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964。

¹⁵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1964。關於黃侃對本書的三項建議，詳述內容為：不宜使用《漢書》樂浪、玄菟兩郡的史事來說明遼東風俗；後漢逢萌史事的補充；以及與鄭孝胥在詩文上嘲諷東北風俗，不需特別引用。同時黃侃也希望金毓黻可以確立「滿州」在東北地區稱呼的意義，並非根於傳統史籍，而是一個人力假借的稱呼，需要考證改定。前述全文見《靜晤室日記》，頁 1963。

¹⁵⁵ 趙銘岐〈金毓黻與《靜晤室日記》〉，頁 10。關於金毓黻赴日一事，可參考梁啓政，〈金毓黻三次域外訪書述評〉與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二文。

¹⁵⁶ 金毓黻，《東北文獻零拾》，台北：華文書局出版，1967，民國廿四年刊本印行。見目錄頁 5-12。

¹⁵⁷ 金毓黻，《東北文獻零拾》，頁 12。

考古(印信出土地點)、時間佐證(印信刻印時間),以及地理考察(印文中地名),在金毓黻的東北史地研究中,可為獨樹一格。

第三節 《東北通史》一書內容與結構

1936年後在南京、四川講學期間,金毓黻因授課需要而編寫東北史課程相關講義,而這份講義即是《東北通史》的前身。1940年,「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在三台東北大學成立,金毓黻也藉此將這份講義影印出版,成為今日所見《東北通史》。¹⁵⁸不同於金毓黻過往的方志寫作與史料編輯,《東北通史》因應授課需要而有時間軸的編排以及歷史主題陳述的規劃。而理解金毓黻對於東北史地研究中,在史事的敘述與編輯有何特色,筆者首先就以下三個面向簡述本書之內容與結構。

第一,是寫作方式與體裁。《東北通史》名之為「通史」,可能包含兩種意涵,其一是傳統的「通史寫作」,如《資治通鑑》、《史記》等有關,而這類的書籍也是金毓黻早年主要閱讀的史書類型;其二是由梁啟超《歷史研究法》一書所提倡的「通史書寫」,確切的說是「普通歷史」的概念,以向大眾推廣歷史知識。從課堂講稿的最初形式來看,本書就某部份來說也服膺「普通歷史」的性質。而金毓黻於本書編著緣起提及:本書的書寫,是希望包含上古至近代的東北發展史。由於時間貫通數代,因此分述上下;上編時間由上古至元朝,下編則由明代寫至當代(1936年止)。¹⁵⁹作為「新通史」或「舊通史」,本書都有其意義。而本書僅為上編,下編因當時戰火影響,因而使金毓黻無法編寫出版,對於近代東北史研究上,甚為可惜。

然而相較於金毓黻過往綜述型的東北史地研究,如《遼東文獻徵略》、《遼海叢書》,是以「遼」稱呼此地,為何在《東北通史》書中明確的稱之為「東北」?金毓黻在此接續傅斯年《東北史綱》的論述,不使用「滿洲」,而以「東北」界定當時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所包含的地區。這樣的界定有在「方位上」的認知,隱含著這一地區是相對應於「西北地區」;今日新疆、甘肅、蒙古一帶的另一塊「邊疆國土」。傳統上以遼東、遼海、安東、盛京、東省等別稱此地,在於這些稱呼都具有中國各朝代行政管理

¹⁵⁸ 金毓黻,《東北通史》,(台北:樂天出版,1971),頁1-2。

¹⁵⁹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75-76。

的實質意義。¹⁶⁰但是不以「滿洲」來稱呼，在於「滿洲」原意為女真部族之一，或為女真酋長的尊稱，並非地理性的名詞。會將「東北」與「滿洲」連繫在一起，起因於「南滿洲鐵路」的建設，日俄戰後，日本在簽署合約上，以「滿洲」簡稱鐵路所經之地，而有此稱。此乃因日本「滿蒙」政策的關係而使用，這是一個政策上的需要名詞，而非現實的狀況。¹⁶¹這樣的認知與當時的中國東北史地研究的主要思考脈絡相符，也如金毓黻在卷首再三強調的：東北史不過作為國史之一部分。¹⁶²

在時間上希冀源遠流長的貫通，不過《東北通史》的格式，卻與近代學術寫作的「章節體」相同，每一章訂立主題，分設數節小題，或敘述，或回應該章之命題。例如首章的「總論」，對於東北地理空間、定義、研究現況的說明，便帶有現代學術寫作「緒論」、「研究回顧」的色彩，後續章節的討論亦有其性質。因而在這樣的格式下，歷史的寫作便不如以往史書以撰述史事為主要目的，而是藉由史事的敘述，考察與研究史事的精確性，或史事之中存在的問題。例如本書元代一章下，元代與東北之關係條目下的子目有：金界壕及邊堡、新舊泰州考、元諸王乃顏之叛、乃顏故地之肇州、哈刺溫考、開元路之設置、開元與開原、咸平治地考、舊鐵嶺考、山北遼東道之設置、元代與東北關係之略表……等，考察元代歷史地理相關條目。¹⁶³

全書的書寫以考察研究為基礎，而金毓黻所採用的方法是透過多項文獻的重疊比對，給予史事的精確定位。實際例證如：在東北民族最早見諸於史籍的「肅慎族」，後改稱「挹婁族」，金毓黻透過《史記》、《淮南子》、《尚書》、《左傳》、《國語》等史料的列舉，說明肅慎族的起源與民族特質；又如隋唐時期對於高麗的出兵，金毓黻將《資治通鑑》、兩唐書中對高麗作戰的相關紀錄，依序編排，建構出完整而詳實的「征高麗史」；另外如漢代在朝鮮地區所設立的郡縣，¹⁶⁴作為唐代重要郡望的昌黎郡，金毓黻也利用類似的方法，來考證這些地點精確的位置。

然而，本書的處理上通貫古今，要面對這麼長的時間，當中必須進行分割，便於敘

¹⁶⁰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23-36。

¹⁶¹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36-38。

¹⁶²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21。

¹⁶³ 朱慈恩〈金毓黻與《東北通史》〉，頁 142。收自《蘭州學刊》甘肅，蘭州市社科院，2008:11。

¹⁶⁴ 相關論述可見《東北通史》第二卷「漢定朝鮮」一篇與第四卷「隋唐征高麗」三篇。

述。金毓黻對於東北發展的主要區分，是以「民族的開發」來分段：第一期為上古到漢、魏時期，以漢族為主的開發時期；第二期為東北滿族中「東胡」與「夫餘」二族相互競逐的時期，時代從晉朝到隋初；第三期為漢族重新開發東北的時期，時代從隋朝到唐高宗朝；第四期為唐中葉到元末，靺鞨、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繼在東北建立政權的時期；第五期為漢族與女真、蒙古族互相競爭的時期，以明一朝為主；第六期則是東北各個族群融合的時期，自清朝至 1936 年。¹⁶⁵以這樣的時間界定，作為全書寫作的主要結構。

在史事選擇上，金毓黻著重於三個層面：第一，是民族活動的過程。一如金毓黻對於東北開發史的分期，在此地眾多民族的開展，形成東北地區的歷史，金毓黻在其中主要介紹各民族之間的競逐與興衰，或兼併，或攻克等史事；此外也詳細考察了各民族稱呼的改變，這一工作對於近代東北民族的梳理有重要的貢獻。第二，是地理環境的介紹。如前文提及的郡縣名稱，還有在東北地區建立的各項交通要道，其連接路線與分布位置，金毓黻也考察了民族在歷史開發的過程中，主要活動的地理範圍，對應於今日應為何處。而這兩個主題，也如前文列舉的《禹貢》諸學人一般，以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研究東北史，和金毓黻最初對於方志的編寫也有呼應。而「民族開發史」的角度，和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清朝全史》二書即以「民族」為切入點討論東北歷史進程，也與傅斯年《東北史綱》，以民族發展為主要敘述脈絡相同。可以看到金毓黻在這一研究的選擇上，加入了當時東北史地研究的主流。

第三，是朝代政權的變遷。這點是金毓黻本書上最具傳統史籍色彩的一面。也是金毓黻討論各民族開發的一項主要基礎，一如前文所述，金毓黻對各民族之間的攻伐、稱臣有諸多描述，而這些競逐的背後，都有民族建立的各個「國」、「朝」、「部」作為基礎，成為民族間的交流手段。因此一部東北史的演進，在金毓黻筆下，有了朝代盛衰興亡的面貌。

除了史事分析與考訂外，金毓黻在每一章節最末，也都作了一些時代的回顧與研究的總結，這點也類似傳統史書的「論贊」。其中在第二、三章的結語中，金毓黻有幾項

¹⁶⁵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27。

評論，在「漢族開發時代」一卷，金毓黻認為：

…綜而言之，漢族之張國威於東北邊夷者，至毋丘儉而極，然國威之替，亦自此始。蓋自曹魏剪滅公孫氏，雖去統一之梗，而亦自撤東隅之藩，去句麗二千餘里，更有鞭長莫及之勢，然魏滅公孫氏之後，以毋丘儉鎮幽州，正如祭彤之守遼東，威懾東夷，坐制一方，奈毋丘既誅，繼任乏材，鮮卑諸族，漸以滋大，終致遼東一隅，淪陷於句麗者，至二百餘年之久。…¹⁶⁶

這段文字似乎有某種指向性。金毓黻在這一「歷史主權」的討論上，對於漢政權對於東北的鞭長莫及，而終遭外族侵入而失去領土，是否間接的去回應了九一八事變下，東北淪陷的現況？

而在東北由「東胡與扶餘」兩民族相互競逐的南北朝進入尾聲時，金毓黻則有言：

…蓋自兩晉以來，東北重鎮之遼東郡，久為高句麗所侵據，名族巨室懼淪夷化，盡室西徙，如韓氏之自玄菟徙居昌黎，即其一證。歷北朝及初唐，中朝之號令，不能遠逾遼水以東，重心之移，蓋由於此，此余所以鄭重論述之也…¹⁶⁷

因為鞭長莫及，所以相信漢政權的民族便移入接近漢政權的地方，是否反映金毓黻自身在滿洲國的統治之外，又藉此來到南京，以避免「懼淪夷化」？

不過，以上論點，只能說是筆者透過金毓黻生命經驗的推測進行附比，但金毓黻這兩句「民族主義史學」濃厚色彩的書寫，反映了他對於東北地區在中國歷史的歸屬認知，這一「歷史主權」追溯的意義，同時也回應日本研究中，東北作為一「獨立性」的區域的論述，對此，中國學界也給予金毓黻「愛國史學家」的評價。¹⁶⁸

第四節 金毓黻之東北史研究與《東北通史》的成就

由於過往清廷視東北為禁嚮，一方面禁止漢人前往屯墾，另一方面漢人對東北的歷史亦興趣缺缺，使得有關東北史地的文獻材料甚少，清中葉以後興起的歷史地理學研究風氣，其主要範疇乃為西北史地，有關東北史地的研究則甚少；在基礎不夠穩固的情況

¹⁶⁶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32。

¹⁶⁷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47。

¹⁶⁸ 直接以此為論述者，為鄭雲波與姜華昌合著〈金毓黻是愛國主義史學家〉，收自《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黑龍江，牡丹江，2001:5，頁 46-50。

下，東北史地研究猶似一片荒漠；所以東北史地研究的拓荒工作，其實是到了九一八以後始漸次展開。而東北史研究在開展上，也缺少整體計畫，學者各自為政，未能攜手合作，以至於常有研究彼此重複的情形出現。最後，因當時東北已淪入日本之手，使得實地考察困難，相關文獻之取得亦較為不易，因而整體的研究成果乃受限制。¹⁶⁹因此，金毓黻本書在「歷史地理學」的範疇中，對 1930 年代末期，中國尚屬散雜的東北史地研究，提供了初步系統化的整理。

就全書的寫作結構來看，本書所反映史學思想的特色以及學術脈絡，除了前章所述的「地方史觀」與「民族主義史學」外，尚有兩點可以討論。第一是「新式史學觀點」，如本書的內容以考察以及提問史事確切發生的時間、史蹟與現今地點的對照為主，反映出金毓黻將歷史學做為一種「學術工作」。以研究討論為中心的歷史書寫，與傳統歷史寫作上以闡發大義、敘述史事有所不同，而金毓黻也在其中接續了中國現代歷史學轉換的這一項特色。第二，是「舊式史學方法」。表現在金毓黻書寫東北史的性質，其一，便是本書對於東北政權「朝代興衰」的書寫。彭明輝稱《東北通史》「書以舊體」，不只是在用字遣詞方面。梁啟超曾言中國傳統歷史「知朝廷而不知有國家」，雖為貶語，卻也直接指出了中國歷史寫作的一項傳統，這項傳統在本書便有很直接的表現。其二，則是本書透過多重文獻的比對考察，來對於史事、史蹟的精確定位。而這樣的方法，來自於金毓黻在乾嘉考據方法的學術訓練。一如金毓黻所言：

…余之研史，實由清儒。清代惠、戴諸賢，樹考證校讎之風，以實事求是為歸，實為學域辟一新機。用其法以治經治史，無不順如流水。……余用其法以治諸史，其途出於考證，一如清代之經生，所獲雖小，究非甚誤。…¹⁷⁰

對於金毓黻本書，往往會與在此之前出版的《東北史綱》相互比較。《東北史綱》由傅斯年主編，並編寫第一卷「古代之東北」，成書目的如傅斯年卷首所言，是爲了要對抗日本「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論點而保護中國領土。¹⁷¹在時間斷限上起于遠古訖于魏晉，全書凡分五章，爲：上古渤海文化、燕秦漢與東北、兩漢魏晉之東北郡縣、

¹⁶⁹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頁 329-333。

¹⁷⁰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5040。

¹⁷¹ 傅斯年，《東北史綱》（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1943），頁 1。

兩漢魏晉之東北屬部、漢晉間東北之大事。又在行文之中，傅氏根據史料把東北史的編寫分解出地望、族類化、諸部推遷、民族之認識四部分。¹⁷²可以看到在史事的處理上，傅氏展現了民族與地理作為邊疆史地書寫的主軸。在史料的選擇上，金氏與傅氏大致雷同，如J. G. Andersson與Davidson Black在華北地區的考古報告、中國舊有方志與正史等，顯示出1930年代中國學界對於東北史地研究上的主要共用材料。不過傅氏本書的編寫較為機械性，例如第二章與第三章的組織較為鬆散，第二章在排比史料之後，僅僅分析燕秦漢時期民族源流以及中原王朝在東北的行政建制，而第三章亦主要是側重於行政建制，其雖有「漢至隋東北諸郡沿革表」詳細考證歷朝的郡縣設置，但卻忽視了文化民族地理等其他方面的內容。¹⁷³但是《東北史綱》的出版，在金毓黻「東北通史」的編寫上，提供了結構性的介紹。

而在中國興起東北史研究之時，對日本方面蓬勃的「滿蒙研究」也開始關注。其中在金毓黻與傅氏的東北歷史書寫之前，已有稻葉君山的《滿州發達史》一書，作為貫通性的東北史書寫。如前文東北史地發展所述，稻葉氏因長於明清史研究，對於東北一地發展，亦著重於明清兩代的討論。本書首二章概述現今日本研究「滿蒙史」的重要性，以及明代以前的「滿州發展」；其後十章則專述明清時期「滿州」一地的各項發展概況。稻葉氏對於「滿州」發展的論述，是以民族為切入點，而本書提名為「發達史」，在於稻葉氏所論述各民族在東北的開發，是以「開發類型」如：交通、貿易、民族交流為敘述主題；除部分主題會以民族的「政治實體」，如遼朝、金朝史事為重心，來說明契丹與女真在東北的開發外，可以看到朝代在本書是做為時間軸的參考，而非論述的重心。這點和中國研究東北史地有很大的區別。

而金毓黻以民族作為東北史地研究的切入點，可能和稻葉氏該書有所連結，如前章所述，金毓黻在1920年代末，閱讀了《清朝全史》與《滿州發達史》，對其在撰寫東北通史的過程，應是參考了稻葉氏的論點。如金毓黻在論述東北開發的起點，便先依據稻葉氏「秦代作為漢人開發東北最初的時代」的論述接續開展，金毓黻首先反駁稻葉氏的

¹⁷² 傅斯年，《東北史綱》，頁107-126。

¹⁷³ 武麗璋，〈傅斯年《東北史綱》與金毓黻《東北通史》之比較〉，頁78-79。

論點，並舉出考古資料說明古代東北的文明發展現況。¹⁷⁴而金毓黻在論述到漢代朝鮮四郡的地理考證時，也藉由稻葉氏的研究成果來輔助考察。¹⁷⁵

除了學術上的繼承性，筆者對於東北通史亦有一些商榷的部分。先要提出的是《東北通史》的基礎，金毓黻在編印緣起提及《東北通史》來自於四川講學的課堂講稿。若以講稿做為載體，在學術敘述上所承載的內容，實顯得有限，全書名之為「通史」，希冀能夠概說東北歷史開發的脈絡與變化，但是全書主題依然有其著重之處，如前段所述以「政治變遷」為主。與金毓黻所規範之「通史」的特性，尚有一段距離。¹⁷⁶筆者認為，本書名之以「政治史」類的專史寫作，可能會更符合金毓黻所希望處理的東北史議題。

其次是史事敘述的偏重，關於這點與金毓黻對於漢民族在東北開發的敘述互為表裡。對於漢民族經營東北方面，除了行政區劃以及歷任職官的考據之外，對於秦漢、隋唐歷朝在「征伐高麗」的過程，金毓黻皆以大量的篇幅考證敘述，在秦漢、隋唐之際，中土政權也有和東北各民族有其他經濟上的交流，金毓黻也在書中有所提及，但著墨不多。再者，金毓黻在述及魏晉時期建立在東北地區的朝代，自「慕容鮮卑」的北周、西燕、前燕、後燕說起，卻缺少了建立北魏政權的「拓跋鮮卑」。在《魏書·禮志》所提到「魏之先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可見北魏拓跋氏族在東北史地開發中有其重要性，雖然確切的證據在 1980 年的嘎仙洞考古發掘才正式發現並切確立拓跋氏族「祖宗之廟」的地點。¹⁷⁷但工於史書文獻的金毓黻，

誠然，以「通史」的形式來敘述東北的發展，在細節上的忽略，在所難免，只是這樣的敘述是否合宜？現今學界稱《東北通史》的敘述兼顧多民族的發展論述，然而在金毓黻論述魏晉時期的慕容氏、宇文氏、段式時，稱其「服膺禮教」，¹⁷⁸因此而被金毓黻特別提出的民族，除了作為東北的主要政權建構，是否也因為認同漢民族文化而值得記錄？筆者看來，這方面表現在金毓黻的史學思想中，似乎有濃厚的漢族認同觀。

第三，是資料引述的疏漏。現今學者稱《東北通史》有豐富的史料運用，包含現今

¹⁷⁴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87。

¹⁷⁵ 金毓黻，《東北通史》，頁 113-114。

¹⁷⁶ 參見金毓黻所著《中國史學史》，〈最近之史學發展〉一章所提之通史與專史的特性。

¹⁷⁷ 相關論述可參見康樂《從西郊道南郊》(台北：稻香出版，1995)，頁 2-3。

¹⁷⁸ 見《東北通史》，頁 216-217，金毓黻對於慕容氏在東北興盛的原因所做的分析。

考古報告、傳統正史、日韓文獻、金石碑文、文人筆記等，但筆者觀察全書所使用的，除了與高麗相關史事加入金石碑文的考釋，如：高麗好大王碑、丸都記功石刻、天泰古印等，全書大部分史事仍多運用中原方面的史料，如：兩唐書、《資治通鑑》、宋朝使臣筆記等，不論是在漢族或是其他民族開發與征伐的部分，更大量運用了中原資料。雖非缺失，但金毓黻多年蒐羅東北文獻，又曾經訪查日韓兩地尋找海外東北史地資料，金毓黻的日記也有相關零星的紀錄，為何會有這樣資料使用上的「取捨」？是否因為抗戰之下而有資源上的匱乏，亦或有其他原因。時人稱《東北通史》是金毓黻體大思精之作，但在史料選材上是否服膺？有待重新檢證。

最後，近年研究對於金毓黻在東北史研究的貢獻上，多強調金毓黻「民族主義史學」特性，或是稱其為「愛國史學家」。誠然，從本書的命名以及史事的評判上，不難看出金毓黻對於漢民族的重視以及中國歷史主權的強調。前文所述金毓黻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將自身對於東北「地方性」的視角，擴大為「國家性」的成分，也與此相關。但若論其學術的根源性，日本方面的研究對金毓黻的影響也占了不小的比例。由陳永昕現今的考察發現：「本書是社會各界和知識份子在滿洲國時期互動激盪下的產物。金毓黻在研究東北史地的過程中，雖不認同稻葉君山、內藤湖南等人的政治觀與結論，但終究受兩人的作品以及彼此之間互動的影響。尤其在日記的記錄中，亦得以檢視金毓黻與楊成能等學者合譯稻葉之《滿洲發達史》的社會面向，包括：稻葉的作品激勵金毓黻對渤海的研究，以及催生日後的《東北通史》……等」，¹⁷⁹然金毓黻本人在論及其東北史地研究相關討論時，對日本方面的研究或部分說明之，或簡略帶過，似乎有意迴避其個人受日本學術影響的部分。那麼，金毓黻的「愛國」，或是「民族主義史學」的史學思想，是否是為了「適應」環境而產生的？當然，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受害者，故土的淪喪固然是悲劇，但是以民族家國的立場來套用到金毓黻本書的目的，是否恰當？有待商榷。

以上討論並非吹毛求疵，主要在於現今評價《東北通史》一書的專文、專著，都給

¹⁷⁹ 陳永昕，美國籍，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2012年漢學研究中心獎助研究學人。以上觀點尚未正式出版，首先發表於2012年12月6日之寰宇漢學講座，講題為「從「滿洲」變身為「東北」：滿洲成為歷史借鏡的過程」，而陳氏試圖對於清帝國轉變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關於「滿洲」（或說東北）的新史書應如何被撰寫；諸如高句麗、渤海之主題又是如何以「種族」與「國家」為中心被予以闡述。作者希望以文本探源方式，透過金毓黻《東北通史》，展現跨國學術交流所形塑出的中國東北國族史。

予金毓黻相當正面的評價，而筆者在此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尙確切說明缺失的原因。誠然，這些缺陷並不一定是作者本身書寫的失誤，也可能是受到時空環境與物質條件的限制，而產生這些問題。但金毓黻「東北通史」的書寫，卻也給日後對於東北開發史的研究大致敘述的架構，奠定中國東北史研究的系統。¹⁸⁰

第五節 小結

相較於近代東北史地研究的發展，金毓黻作為東北地方的學人，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可說起步稍早。而初期以傳統史著的編寫與文獻史料的徵集編纂，對於金毓黻與 1930 年代以降著手研究東北史地的學人，提供很好的接軌。在豐富的史料掌握方面，也讓金毓黻以現代史學方法處理相關議題時，有駕輕就熟之感。在學術的操作上，可以看到本書有相當濃厚的傳統學術色彩，以文獻、考據等方式來處理史事，但在行文的格式以及寫作目的上，又顯現了近代新式學術寫作的型態，傳統與現代的史學認識顯著的反映在本書，顯示了金毓黻史學思想中，「新舊調和」的特性。而金毓黻在本書史事的處理以及地理空間的掌握，在「去中原中心史觀」上，受限於史料的運用而較不明顯，但民族主義史學的闡發，則表現在本書對史事的論贊之中。故《東北通史》作為金毓黻東北史地研究中，屬於系統編寫的作品，對於金毓黻之史學精神，在方法與史識兩部分因此體現。

¹⁸⁰ 例如現今學者佟東所主編之六卷本《中國東北史》(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以及李治亭所編著《東北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一書，在基本的論證上，和本書類似，不過對於更多細部的東西，如藝術、文化等方面都有新的補充。

第三章 金毓黻之史學史研究

在東北史的文獻徵集與歷史考察之外，金毓黻的史學史研究在近代學術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氏作《中國史學史》是兩岸對於金毓黻更為熟悉的學術成果。本書在近代各類中國史學史著作的編述中據有一席之地，也是現今大專院校歷史學系授予史學史課程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本章接續以《中國史學史》(以下簡稱本書)作為主要分析文本，來理解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另一層面。本章首先簡略說明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的發展脈絡，以及金毓黻與這一學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接續簡介本書內容大要與成書背景，並在這一背景上，解析本書所反映金毓黻的史學方法與史學思想。

第一節 中國史學史的傳統與近代學科的成立

關於史學史的定義，在白壽彝《中國史學史》一書有如下定義：「史學史，是指歷史學發展的客觀過程，而本書便是以中國史學為對象，按筆者理解，進行中國史學發展的進程與規律進行論述。」¹⁸¹由此觀之，所謂的「史學史研究」雖然在中國學術發展中，是較為近代所產生的學科，但在中國長期的史著編纂發展上，即有類似「史學史」的書寫或專門作品。以傳統史書為例，在專書或專文方面，有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劉勰《文心雕龍》之〈史傳〉篇三者較為著名。〈史傳〉一文介紹先秦至魏晉以來著名的史書，劉勰針對各書內容、優劣作出評論；¹⁸²《史通》討論唐代以前的史學發展以及歷史寫作的相關問題，如體例、方法，以及自唐代開始的史館修史制度有何弊病；¹⁸³《文史通義》將中國歷來的典籍重新劃歸為歷史文獻，討論歷史寫作的性質與方法外，也討論史學的內在精神。¹⁸⁴

另一類類似於史學史的書寫，是傳統「目錄」的編纂。如正史之中的「藝文志」、「經籍志」，或是特別編修的大型叢書，如宋代的《冊府元龜》、清代的《四庫全書》，其中對於史部書籍，依序朝代編排羅列，也可從中整理出中國史學研究的發展。此外，也有

¹⁸¹ 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20-21。

¹⁸² 關於〈史傳〉篇的介紹與研究，可參看汪榮祖，《史傳通說》一書。台北：聯經出版，1988。

¹⁸³ 關於《史通》一書專門討論，台灣方面有林時民〈劉知幾及其史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71學年碩士論文)與《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等專書專文。另外如逢耀東、李紀祥等人，也有相關文章討論，在此不多贅述。

¹⁸⁴ 關於《文史通義》一書之討論。有楊志遠《章實齋史學思想之研究》(東海大學81學年碩士論文)，亦針對文史通義所呈現之「道」的意涵進行分析。

散見於其他學人的作品中，對於傳統史學發展的介紹。例如司馬遷在《史記》的行文中，說明史料運用的方式以及性質，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論先秦六家要旨，也是對於傳統學術發展的回顧。¹⁸⁵但以上所述，只能說是「廣義的史學史寫作」，或是中國史學史研究中的「歷史基礎」，這些與近代所產生的史學史研究仍然有一段距離。

近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產生，與梁啟超等人提出「新史學」，對於民國以來的歷史學改造有關，改造的面向如歷史學主題的擴大與細緻化，即「通史」與「專史」書寫的提倡；以及史學方法的革新，尤其對於「研究」的部分有所強調。¹⁸⁶在提倡新的學術發展同時，學人也對於過去學術作一總結，即清代的學術發展，如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人都有相關的作品，整理內容則包含文學、經學、史學…等學術成就，以及清代學術發展的特色。¹⁸⁷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史學史的做法〉一文，說明當代「史學史」這一命題應當著手進行研究的原因：「…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厲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作史的資格，…」¹⁸⁸，而梁啟超在本文所認定，作為史學史一科的基本資料，和前段所述金毓黻的早年閱讀，接受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概念雷同。梁啟超在後面的行文中，又將經、子、集三部傳統著作，區分為文學史、社會史、思想史等類別，¹⁸⁹因此梁啟超認為「所以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哪部分多，還是史部。」，其原因在於「中國全個國民性，對於過去的事情看得重。……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常以過去的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¹⁹⁰從這一段話回應前段對於金毓黻 1920 年至 1925 年間的閱讀類型，在梁啟超的分類，或是金毓黻所接收章學誠的概念下，也是一種廣義的「史著閱讀」。

在 1920 年代對於「史學史」研究的討論，最初並不稱為「史學史」，而是以「史學概論」，或「史學通論」等名稱出現。如朱希祖(1879—1944)《中國史學通論》、柳詒徵

¹⁸⁵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2002)，頁 11-19。

¹⁸⁶ 對於中國近代學術的變遷，可參見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王汎森《古史辯運動的興起》、陳以愛《現代中國學術機構的興起》、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以章太炎與胡適為中心》、劉龍心《學術與制度—中國現代歷史學科的建立》等書。另外對於中國近代在「史學史研究」的成立與發展上，以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一書，有詳盡的討論。在本節將引述部分章節作為背景介紹。

¹⁸⁷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23-30。

¹⁸⁸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頁 261。

¹⁸⁹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261-262。

¹⁹⁰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262。

(1880—1952)《國史要義》、李大釗(1889—1927)《史學要論》等書，以上作品主要介紹中國史學的學術方法、學術特色等。¹⁹¹亦有透過介紹西方史學史之後，進一步成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途徑，如何炳松在翻譯 James Thomson Shotwell 的《西洋史學史》後，進而引起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志向。¹⁹²

而對於「中國史學史」這一命題，在研究方式與書寫結構的提出，梁啟超於〈史學史的做法〉一文提出了四個書寫要點：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與發展，以及最近中國史學的趨勢。¹⁹³但梁啟超只提出了相關的論述，並沒有對此寫作格式進行實際的整理與書寫。但接續這一概念的，是梁啟超的學生：姚名達(1905—1942)、衛聚賢(1898—1990)、劉節(1901—1977)等，在之後進行中國史學史的書寫。

進入到 1930 年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開始起步。但最初的形式，還是以「史學概論」，或「史學通論」等名稱出現，粗略的統計，這一時期以這類型式出版的書籍，多達 30 餘種。¹⁹⁴這些著作最初的形式，是在大學之中的相關課程所編寫的講義，並在日後出版。而這些著作的產生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在此之前長期發展的，關於史學理論的引進與建立，即晚清至民初，自歐洲與日本所引進的史學理論著作，成為這時期史學理論著作的重要基礎；第二，是在新史學概念持續延伸下，為了促進史學發展，而必須持續建設史學理論；第三，是西方史學理論的持續引進，給中國的史學理論提出新的思想養料；第四，是因應新式歷史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作品。¹⁹⁵在這些著作中，都有專門的篇章討論史學的發展。如「中國史學界之回顧」、「西洋史學界之回顧」、「史學淵源」、「中西史學演進之大概」等，可以說是「史學史專題」書寫的第一個階段。¹⁹⁶

¹⁹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35-50。

¹⁹²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50-51。

¹⁹³ 本條目參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史學史之做法〉一文。

¹⁹⁴ 較為著名者如盧紹稷《史學概要》(1930)、曹聚仁《中國史學 ABC》(1930)、劉劍橫《歷史學 ABC》(1930)、羅元鯤《史學概要》(1930)、吳貫因《史之梯》(又名《史學概論》，1930)、趙吟秋《史學通論》(1931)、周容《史學通論》(1933)、劉敬白《何炳松歷史學批判》(1933)、衛聚賢《歷史統計學》(1934)、胡哲敷《史學概論》(1935)、李澤綱《史學通論》(1935)、楊鴻烈《史學通論》(1939)與《歷史研究法》(1939)。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64。

¹⁹⁵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65-66。

¹⁹⁶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67。

除了學院中的教材外，在 1930 年代的史學史研究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據統計，相關研究論文有 280 餘篇，關於史學與史家的專門著作有 10 餘種，¹⁹⁷其中較為著名的研究人爲劉咸炘(1896—1932)、宋慈抱(1895—1958)、傅振倫(1906—1999)、鄭鶴聲(1901—1989)以及姚名達等人。劉咸炘著有《四書知意》、《史學述林》等書。其中《四書知意》是對於前四史的評論，《史學述林》則是收錄劉咸炘 1919 至 1928 年間，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論文總集。¹⁹⁸宋慈抱著有《續史通》一書，是一部舊式體裁的論文集，原始的文章則刊載於浙江《歐風雜誌》月刊上。全書體裁則類似《史通》的做法，選題上也與《史通》類似，不過加入了新的學術例證，某些地方也提出了作者自身的見解。¹⁹⁹

傅振倫是朱希祖的學生，主要的作品爲《〈史通〉之研究》、《劉知幾年譜》。傅振倫對於《史通》與劉知幾的興趣，主要來自於北大求學時期，因朱希祖的講課而引起。而傅振倫在日後進入大學教書，也開設「中國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名著選」、「史學方法論」等課程，同時編寫講義，豐富了近代中國史學史書寫的內容²⁰⁰。而鄭鶴聲爲柳詒徵的學生，同時也是較早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年輕學子。最主要的作品爲《漢隋間之史學》，與四冊之《中國史學史》。前者爲鄭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院的畢業論文，後者爲鄭氏在雲南高師授課的講義。²⁰¹

姚名達是梁啟超的學生，在民國學術史上以目錄學聞名，氏作《中國目錄學史》爲代表作。但姚名達對於史學史書寫亦有相當的熱誠，也擬定了相當巨大的史學史寫作計畫，包含 12 種史學叢書、11 種史學家傳記、21 種史學方法書籍等。²⁰²但因爲姚名達於對日作戰時犧牲，這些計畫與書稿在之前也未刊行出版，之後也多半亡佚。

如前文所述，關於「中國史學史」這一研究領域，自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的發展，各門各家有相當豐厚的成果。然而在研究取徑當中，從命題上以「史學概要」、「史學通論」，或是對於傳統史籍中，帶有史學史書寫性質者進行分析，進一步論述中國史學的發展。就性質而言，可謂百花齊放，但是並無一個主要的規範來討論「中國史學」的發

¹⁹⁷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73。

¹⁹⁸ 其中《史學述林》共有三冊，參見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74。

¹⁹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75。

²⁰⁰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77-78。

²⁰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79-80。

²⁰² 周文玖，《史學史導論》(北京：學苑出版，2006)，頁 107。

展。直到 1940 年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較為正式的定義以及規範，在金毓黻本書出版之後，「中國史學史」作為大專院校的課程，有了獨立的地位。²⁰³

第二節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之編寫過程

但嚴格來說，金毓黻的史學史研究開展有某種突兀性。主要在於金毓黻的史學史研究並不如東北史研究一般，有長期的資料蒐集與研究，而是短時間的集中在 1938 年至 1939 年間的書寫。在金毓黻早年有關中國史學相關的學習上，確實有閱讀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一書，但在此之後金毓黻的閱讀與研究，並無專門於「史學」一門方面。

觀察金毓黻 1938 年至 1939 年間的日記，對於《中國史學史》一書的書寫歷程有詳盡的記錄，同時也記錄了金毓黻個人所參考的某些與史學史有關的資料。不過在此之後，金毓黻對於史學史研究的相關紀錄，相對稀少。因此要討論金毓黻史學史研究，必須先說明本書的成書經歷。以下以表格的方式呈現這段紀錄²⁰⁴：

時間	書寫進度	參考書目	對於書寫與參考書籍的備註
1938 年 2 月 23 日	始撰《中國史學史》。		無可依傍，以意為之。梁任公於其《歷史研究法續編》中有中國史學史做法一節，尚可取賢，惟語焉不詳。聞衛聚賢撰有是書，由《大公報》出版，亦未之見。
1938 年 2 月 25 日		得向達譯本《班茲史學史》一小冊。	所論頗能概括要旨，雖為外人著作，足供資考之用，亟閱一過，啓發頗多。
1938 年 2 月 26 日	撰《史學史》導言竟，接撰第一章古代之史官，約得三千餘言。		
1938 年 3 月 2 日	撰《史學史》稿第一章《古代史官》竟。		取材不豐，筆不達意，殊為愜心。
1938 年 3 月 4 日	撰《史學史》第二章《古代史家與史籍》。		
1938 年 3 月 14 日		張孟劬(爾田)《史微內	

²⁰³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頁 95。

²⁰⁴ 資料整理自《靜晤室日記》，頁 4103-4366。

		篇》四卷，凡三十八篇，刊行甚久。	
1938年4月1日	撰《史學史》第三章竟。		
1938年4月11日	撰《史學史》第四章。		取材稍多，非一、二日內可了。
1938年4月15日	撰《史學史》第四章竣，得約萬餘言。		
1938年4月25日		閱全謝山《經史問答》凡十卷，第八卷以下論史，均百餘篇，首數條論《戰國策》，其餘皆論《史》、《漢》。	全氏所論多屬細事，而持論頗精審，不似西莊商榷之粗疏，自屬當到此家。
1938年4月26日		錢辛楣先生《潛研堂文集》有《答問》十二卷，中有兩卷論諸史。	多極精之語，似勝於謝山之《問答》。
1938年5月5日	撰《史學史》第五章竟。		
1938年5月8日			余撰《史學史》原定八章，茲以尚有未被，增二章，非十餘萬言不能盡。
1938年5月19日	拙撰《史學考略》記分十章，約十萬餘言，撰稿已逾半，秋間乃能畢功，已為檢出一份，覓便寄上。 ²⁰⁵		
1938年6月19日		《隋經籍志考證》十三卷，清章宗源撰。	
1938年7月7日	撰《史學考》中修改《宋史》一節。		頗能究其始末。
1938年7月22日	撰《史學考》修改《元史》一節竟。		續撰自正史中分傳之別史，如馬、陸二氏之兩《南唐書》是其例也。錢士升《南宋書》自《宋史》分撰，欲以上繼《東都事略》，而實非其倫，其可稱者，其謝啓昆之《西魏書》，吳任臣之《十國春秋》乎。
1938年7月29日	撰《史學考》第七章，		

²⁰⁵ 文句來自日記所記〈復徐行可牋〉，頁4156。

	具稿已六七十頁，而未畢其半，何繁而不殺，一至於斯也。		
1938年8月24日	閉戶草撰《史學史》。		凡得十餘頁，近一月來所未有也。
1938年9月7日	輯《史學考》紀傳體之正史、別史一節將竟。		覆視初稿，久之太煩。
1938年9月15日	撰《史學考》紀事本末一節。		于諸家所論之外，又有采獲，自謂不無一得。
1938年9月22日	撰《史學考》第七章竟，得六萬餘言。約當第一章之五倍，第六章之三倍。		殊煥其繁，然亦欲簡而不得者。
1938年10月14日	撰《史學考》第八章，得約二萬餘字。		
1938年10月23日	撰《史學考》第九章竟，約一萬五六千言。		
1938年10月24日	撰《史學考》第十章。		以近期重要發現為基礎，如殷墟之甲骨、敦煌之木簡與寫本、內閣大庫之檔案三者是也。
1938年11月17日	續撰《史學考》稿，每日約得二三千言，以其十餘日畢功。		
1938年11月21日			近日撰《史學考》頗有進益，行將終焉。
1938年11月23日	撰《史學考》第十章竟。		其所缺者為結論一首，約二千餘言可畢，當於一二日內成之。
1938年11月26日	撰《史學考》結論畢。		自本年三月始功，十一月末訖功，凡九閱月，中間旅行約一閱月，實為八閱月，記二百四十餘(日)。全書十章，合導言、緒論，凡得二十萬言，每日平撰稿一千字上下，此旅川以來讀史之所得也。
1938年12月17日	改撰《史學考》第一章古代史官。		原稿十存其三，易者約十之六、七。

1938年12月22日	改撰《史學考》古代史家與史籍一章，大致已畢。		因未細讀原文，改過之後，方知重複。可知刪改之作，有不如原文之佳者，凡事求之過細，往往欲益反損。
1939年1月1日			…嘗謂吾師之史學，可在國內自豎一幟，發前人所未發者甚多，而是人多不之省何也？近撰《史學考》，引用師說甚多，即緣此故。… ²⁰⁶
1939年1月31日	整理《史學史稿》略竣。		
1939年2月10日	以《史學考》中最近史學之趨勢一章，送《新民族週刊》發表。		
1939年2月22日	修改《史學考》第五章粗畢。		
1939年6月3日	訂補《史學考》全稿，竭一日之力，仍未能畢。		此稿凡補定多次，甚矣，撰作之難也。
1939年9月15日	修訂《史學史》稿本，須費數日之力。		擬托郭任生攜往香港，交商務印書館排印。
1939年9月18日	修正《史學史》稿本畢事，稍有增纂。		

從以上的表格筆者首先指出幾個可以討論的面向，第一，是本書書寫的動機。對照前文所述近代中國史學史的發展來看，因應史學改造而設置於學院課程的「中國史學史」，加上金毓黻 1937 年即開始於四川任教，對這一主題的書寫，就帶有教科書編寫的意涵，這點和前章的《東北通史》有共同的出發點。然而為何校方派以金毓黻此一對於中國史學發展相對陌生之人為授課者？在日記中並無特別說明。

第二，是本書書寫的時間點以及間隔。排比這些紀錄可以發現，金毓黻對本書的編寫相當迅速，全書十個章節，而一個章節的完成約以一個月結束，加上 1938 年正是中日對戰時期，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中，金毓黻也記錄了每日的空襲現象。戰時物資的缺乏，以及危機對於學術研究的迫切，應是金毓黻在本書編寫中，不得不如此迅速的原因。

²⁰⁶ 原文出自「致朱退先師函」中，錄自《靜晤室日記》，頁 4445。

第三，關於編寫本書的參考書目。最初金毓黻稱「無可依傍，以意爲之」，只有梁任公《歷史研究法補編》和衛聚賢的作品可以參考，不過在日後，金毓黻也依序參照了不少著作，如：美國史學家 Harry Elmer Barnes、張爾田、錢大昕、全祖望、章宗源等人的作品，對「史學史研究」相對陌生的金毓黻來說，這些作品應是提供了相當的幫助。粗略的來看，包含了歐美史學史、傳統史學的探討、經學與史學的對話，以及目錄學的編制，而這些元素是否有運用於金毓黻的書籍中？在接續的章節會進一步檢討。

最後，是全書命名的改變。本書的命名在「史學史」與「史學考」之間擺盪。根據鄭善慶的考察，金毓黻本身對於「史學考」一名較爲中意：「無錫錢子泉近撰《經學通志》，余未及閱，而喜其名甚雅。余撰《中國史學史》，初以其名甚新而不典，易稱《史學考》，如仿錢氏之例，應稱《中國史學通志》，或簡稱《國史通志》，或《國史通考》，斯不致言不雅馴矣。」²⁰⁷因此「此書定名，本欲仿中國傳統史學之例，命爲典雅的《史學考》，然而最終選以史學史爲定名，在於「現代學術分科之下的史學趨向，使得著作的最終定名亦不免附和于西學潮流。」從此段論述可以得知前段所述，新歷史書寫中，專史寫作的概念，在金毓黻對於本書的命名上有所體現。²⁰⁸

第三節 《中國史學史》全書內容與結構

金毓黻於本書導言中提及：「…謹依劉、章之義理，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爲訟說之資，若夫正謬補遺，始終條理，政有待於異日，更所望於方聞。…」，現今研究則以此文句，稱金毓黻繼承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史學史的做法」所提出的項目作爲全書書寫綱領，同時也繼承了梁啓超對於史學史寫作的精神。²⁰⁹對此，筆者但以這樣的概念著手，將本書全篇十章依「史官」、「史家」、「史書」、「史學」，以及「最近史學發展與趨勢」等各子題區分，說明本書內容與結構。²¹⁰

首先是史官，也是本書首篇的主題。金毓黻首先透過對於史官的原始工作，以及「史」的甲骨文含義，說明史官在中國最初的樣貌，是做爲「文獻管理」與「文字記錄」的人

²⁰⁷ 鄭善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定名初考〉，《史學史研究》，北京，2011:1，頁 123。

²⁰⁸ 鄭善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定名初考〉，《史學史研究》，頁 123。

²⁰⁹ 霍明昆對於金毓黻史學史研究的內在影響即採此說，參見霍明昆〈再析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撰寫中的影響因素〉，《安徽史學》，安徽，2010:4，頁 5-10。

²¹⁰ 本文據南京大學出版社 1944 年初版本再印版摘錄。

物，在周禮所稱的五史：大史、中史、小史、內史、外史，以及左史、右史等古代「史官」的職位，是對於各種不同事項的記錄與管理。但在此一時期的職掌只是記錄，並無編寫的工作。然而因為史官掌握了文獻，同時也掌握了知識內容，春秋戰國時期，所謂「諸子出於王官之學」，由來於此。而從司馬遷以「太史令」之姿編寫了《史記》，產生了「史官修史」的錯覺，進而在日後，「史官修史」成爲一種常態。

漢代以後，修史的「史官」並不多用「史」來命名官名。有稱做「著作」、「著作郎」、「著作佐郎」者，從漢明帝之時直到魏晉，到宋代也重新使用。也有延續稱做「史官」，從北齊、北周至遼金以降，中央都設有「史館」，做爲國家編寫歷史的主要機構，在史館中編寫史書的官員，即稱之爲史官，或有史館學士一稱。最後是從唐代中央設立的翰林院，原來是做爲公文書寫的單位，到元代轉變成翰林國史院，負責監修國史。明清之際延續這樣的制度，設立了侍讀、侍講、修纂、編修、檢討等官職，通稱爲「翰林官」，成爲另一種史官的代稱。而史官與史館的設置，同時也標注了中國歷史的傳統：以國家力量編修歷史。這一種對於歷史的編修有其利弊，當然，透過國家的力量可以全面的處理各個類型的歷史議題，集眾人之手的書寫也有一定的效率。只是身在權力中心的史官們，下筆之際不免受到統治者的干預，也因為所蒐集的材料關係，主題也有所侷限。史館史官修史的「公正性」與「全面性」，在此受到質疑。而史館與史官的設立，直至民國仍未廢除，也成爲中國歷史書寫與現代歷史研究的一項主要機構。²¹¹

其次是史書。史書介紹可以說占了全書大部分的篇幅，金毓黻首先採用一種廣義的觀點來界定史籍，也就是任何的紀錄性作品都可以稱之爲「史籍」，這一說法可說是延續梁啟超借用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金毓黻先指出《詩》、《書》、《易》、《禮》、《春秋》各經書的歷史紀錄價值，並將後代與其性質類似的書籍作一連結，而最初整理與書寫這些書籍者，如孔子、左丘明等，就是最初的史家。

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的歷史書籍也不斷的在編寫、生產。中國史書的類別粗略可分爲「官修」與「私修」。官方修纂方面即爲史館的主要工作，從唐代設立史館以來，主要編寫的史書類型有四類，分別有：以編年爲架構，記帝王言行的「實錄」；對於前

²¹¹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2004），頁 129-136。

朝進行總結的「正史」，今日所見之廿五史即屬此類；第三是對於儀式、制度、法規相關的紀錄，稱之為「典禮」類的書籍，如《會要》、《會典》、《通典》等；最後是與地方發展有關的「方志」。

私人修纂方面，從魏晉時期至隋唐，私家修史的現象相當的蓬勃，此一時期的私人史書作品，集中於東漢史、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以及南北朝史五類書寫。而此一時期的書籍大部分都亡佚，除了在藝文志、經籍志中可見書名外，有些在後代則以輯本的形式出現。最後傳世的，即為中古史文獻中的「十七正史」。²¹²唐宋後，私人修史的內容亦分成四類，分別為：以紀傳體書寫的「別史」，是在正史之外，個人編寫的朝代史；其次，是《資治通鑑》的編年體書寫，從司馬光以下，開啓了以《通鑑》的體例為主的歷史書寫，另外也對於《通鑑》內容進行相關的考釋；而因為《通鑑》的關係，而延伸出來以事件為敘述綱領的「紀事本末體」，是唐以後私修史書的另一個類型；最後，是以典章、志書為主題所書寫的通史專史，鄭樵《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即為此類。

在史書的介紹上，金毓黻對於每篇史書，除了作者、書名、成書時代之外，對於書籍的內容以及所延伸的書寫議題，都有簡要的說明，透過金毓黻史書的介紹，除了理解中國史書書寫的類型，也可觀察到史籍所處理的議題變化，這樣的處理方式與其他的史學史作品有所不同。

接著是史家與史學，在這個主題下，金毓黻以班固、司馬遷、劉知幾、章學誠四位史家，以及清代以來各史家及其著作為主。首先是班、馬二人，金毓黻先對兩人的生平以及《史記》、《漢書》的書寫始末做一介紹，可以發現司馬遷和班固的書寫都繼承父輩的基礎持續延伸。而《史記》在中國史書的書寫上，有其創新，在於紀傳體體例的書寫，以及綜合先秦史書的各種類型，融合成本紀、列傳、世家、表、書等主題，而班固延續司馬遷的概念，成為《漢書》寫作的基礎。同時也奠定了中國日後「正史」寫作的規範，以及「通史」寫作的概念。金毓黻稱司馬遷的史學，是「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質，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而班固的史學則是「不激詭，不抑抗，瞻而

²¹²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 88-112。

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晝晝而不倦」。不過對於兩人的介紹，金毓黻還是著重於《史記》與《漢書》書寫的特性與結構的延續，對於內在的精神則著墨甚少。²¹³

其次是劉、章史學，對於二者，金毓黻以《史通》與《文史通義》二書為主要分析。在《史通》方面，金毓黻介紹了成書來歷、各篇主題大要、《史通》一書的中心論述，而透過《史通》的閱讀可以學習到的史學知識。最後介紹後世對於《史通》的考釋、續作，以及劉知幾的其他著作。其次在《文史通義》方面，金毓黻則介紹章學誠在本書的五項史學觀點，分別為「六經皆史」、「記注與撰述的分別」、「方志的功用」、「校讎之學」，以及「史學的闡明」。其中，金毓黻對於章學誠在「方志」與「校讎」的觀點上又進一步的討論，這點可能和他本身的史學經驗有所關聯。本章的最後金毓黻提出鄭樵與劉、章二人相比，不過金毓黻認為，鄭樵雖然在校讎方面有深厚的功夫，有精確的敘述，卻不如劉、章二人有完整的體系與思想性，因此不如班、馬、劉、章諸人有獨立的介紹。而第三個篇幅是清代以來各史家，金毓黻從浙東史學出發，經過考據學史家、邊疆史學家，以及清末的王國維，共廿餘位史家，簡述生平、學術成果以及學術特色，但是著重於介紹的層面，關於考據史學、邊疆史地研究背後的學術精神，同樣著墨不多。

最末，是最近史學發展與趨勢，介紹民國以來的史學成果與史學理論發展。民國以來的史學成果主要以新材料的發現與整理為重心，如殷墟卜辭、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以及在民國以來所發現的古代漢族以外的各民族文字。除介紹史料之外，金毓黻也引用了梁啟超對於史料的認識、分類與鑑別方法。而史學理論發展則主要從梁啟超的理論出發，對於中國從 1920 年代以來所提倡的「新歷史」，以求改造中國的傳統歷史書寫，新歷史的書寫主要分通史與專史兩類。通史或稱「普通歷史」，不同於傳統通史寫作單純求賅時性以及長時間的敘述，現代的通史寫作更要求在長時間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歷史發展的脈絡。專史或稱「專門歷史」，是自梁啟超以來對於中國傳統知識中，因為分類不明確而希望有所改造的部分，希望將中國傳統知識內涵做更細緻的切割，有利於往後中國歷史的書寫與研究。除梁啟超之外，柳詒徵、朱希祖等人，皆有提出關於通史與專史寫作的各項主題，金毓黻同時也將這些主題和過往的史書類型對照，指出新

²¹³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 87。

歷史與舊歷史寫作的差異。²¹⁴

金毓黻在本書的結論指出：綜觀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可以分爲五個時期：上古至漢初的創造期、兩漢之際的成立期、魏晉至隋唐的發展期、唐至清末的蛻變期，最後爲民國以來的革新期。²¹⁵而這樣的五階段分期，與何炳松的三階段論有所類似。而全書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史籍之要刪」以及「史學之總錄」，可知對金毓黻而言，「歷史學」的內涵，是以史書構成的。²¹⁶

第四節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一書之成就與特色

周文玖對於《中國史學史》一書給予四項正面的評價：內容豐富，典籍整理條理有序；充分利用表格協助資料爬疏；透過「以類相叢」的原則，歸納整理各朝史書；且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後，並於其中提出自身見解。²¹⁷對於 1930 年代末漸次開展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中，金毓黻本書的出版，有某些奠基性的意義，某方面來說，是對於梁啟超史學史寫作概念的實踐，也是對於中國史學，自上古到今日成就的總結。²¹⁸而金毓黻在全書中，高比例的對於歷朝史籍進行敘述，在於其認爲「史學史的研究，是對於史籍中所包含的史意及史法，和史家關於史意或史法的見解」。²¹⁹

但史學史的研究對金毓黻的突兀性，在本書的書寫中尚存在一些缺失。周文玖指出，本書在編纂思想與架構之間有所矛盾。首先，是章節題目的設定：例如關於私家修史以及史館修史的部分，並非說明私修史書與官修史書的起源與歷程，而是羅列各項史書的介紹；而對於班、馬、劉、章諸人的史學，對於班、馬二人，著重於生平介紹，劉、章二人的史學有概略的說明，但少了基本的認識。²²⁰再者，是編纂體例的區分，以金毓黻所述唐宋以來「私修史書」與「設館修史之始末」兩章節爲例，雖然區分了私修史書與官修史書的差異，卻割裂了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²²¹最後，是時間敘述的模糊，如金毓

²¹⁴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 374-378。

²¹⁵ 此一觀點，在金毓黻 1938 年 3 月 4 日的日記中曾經提出。見《靜晤室日記》，頁 4107。

²¹⁶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 386。

²¹⁷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頁 109-111。

²¹⁸ 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頁 166。

²¹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頁 107。

²²⁰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頁 107-108。

²²¹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頁 109。

黻所設定的唐宋以來官修與私修史書介紹，時間即延續至清代，但在最末兩章，又專立清代史學之介紹，敘述上不免有所重疊；另外金毓黻在日記中所提到的五階段史學史分期，在全書並未特別使用，只有在結語提及分期概念，但在 1957 年重修的序言中，又淡化了這樣的概念，若非從結語與日記所述觀察，無法清楚理解金毓黻史學史分期的原因。²²²

從日記所反映金毓黻對於史學史研究著手時，因為研究領域的陌生，在書寫上必須參考一些作品，在最早期，金毓黻曾閱讀過朱希祖所著《中國史學通論》，在著手書寫史學史時，又參考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對金毓黻而言，此二書是他最初的史學史材料，同時也是現今研究中，直接影響金毓黻史學史研究的主因。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最初提出「史學史」這一概念的作品，梁啟超的對於史學史的四大內涵，也是金毓黻起草的最初架構，但就每一主題觀察：梁啟超對於史官，除了歷史發展變遷外，更強調史官的「尊嚴」，及史官在修史中的獨立精神；²²³但金毓黻對於史官的論述，著重於演變源流，對於其獨立性，並未多有著墨。在史家方面，梁啟超認為「做為史官的史家」以及「非史官的史家」，是史家書寫中需要去注意的面向，同時也列舉先秦至元明間，眾多史家的史學特色；²²⁴但金毓黻專談孔子、左丘明，與班、馬、劉、章諸人，所論內容也較為單一。在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方面，兩人的認知就有很大的差異，前文以敘述金毓黻以史書的羅列做為史學發展的基調，而梁啟超則針對劉知幾、章學誠、鄭樵三人的史學理論在中國史學發展中的影響，同時加入了史學與文學和道學間的關係。²²⁵而最近史學的發展一環，梁啟超但言介紹的用意，金毓黻也對此進行整理，在這方面兩人的認知就較為相近。²²⁶因此學者稱金毓黻「在梁啟超的藍圖上填寫了史書的目錄，有時對這些書做了簡單介紹和評論」，是較符合梁啟超對金毓黻史學史的影響層面，而這個影響層面，是結構性的，並非「思想性」的。²²⁷

而金毓黻最早接觸朱希祖之《中國史學通論》，對照氏作，則有較多的共通性。朱

²²²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頁 108-109。

²²³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264-265。

²²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266-270。

²²⁵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270-275。

²²⁶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275-276。

²²⁷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頁 166。

氏《中國史學通論》分兩部分，一為「中國史學之起源」，二為「中國史學之派別」。對於史學的起源，朱希祖首先從「史」字的本質進行討論，進一步延伸「史」字做為「紀錄」以及「官職」的意義，而從紀錄與官職出發，進而衍伸成為現今定義的「歷史」。這一形式對於中國史學的起源，與金毓黻在史學源流的考察上，有高度的雷同。²²⁸另外在中國史學的派別上，朱希祖將中國史籍分為「記述主義」與「推理主義」兩類，於此兩類再下分六項史書類，為：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與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²²⁹對於這六類史書，朱希祖著重於體例特性與寫作方式的介紹，在其中列舉的史書，則做為例證之用，與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一書中大量羅列書籍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朱希祖在其餘有關中國史書的考察文章，如〈漢十二世著紀考〉、〈漢唐宋起居注考〉、〈蕭涼舊史考〉等，便與本書的羅列史書，一一評述的方式雷同。可見朱氏的史學史概念，在金毓黻本書中有隱微的繼承。

透過研究方法的類比，觀察金毓黻對於梁啟超與朱希祖的學術繼承上，也反映金毓黻對於新、舊史學的認知與取捨。而除了從新、舊史學的角度來觀察金毓黻的史學史研究，筆者認為《中國史學史》一書大量的書籍介紹，另可從「目錄學」的角度來觀察。本章首節提及，做為廣義的「史學史」寫作，中國傳統的目錄編制也帶有這樣的性質。關於目錄的編制與發展，初步成形者，從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與《別錄》發端，《隋書·經籍志》記載：「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就，向輒別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又，在章學誠《校讎通義》序言中：「劉向父子，部次調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²³⁰因此目錄的製作除了用作知識分類外，也具備學術發展梳理的功能。

傳統目錄的編修，在官方與民間皆有發展。而目錄的類型，依余嘉錫所言可分三類：第一是歸納書籍部類之後，題以小序說明該類書籍之特性，並且在各書目下簡略介紹該書，這一類的目錄多命名為「提要」，如《四庫全書提要》、《叢文總目提要》、《直齋書

²²⁸ 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台北：莊嚴出版社，1977)，頁 7-28。

²²⁹ 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頁 28-31。

²³⁰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 1。

錄解題提要》……等；²³¹第二類是歸納書籍部類，題以小序說明，但不對各項書目介紹，正史之中所編列的藝文志、經籍志，前文所述《七略》、《別錄》二書，以及章學誠《校讎通義》，即屬此類²³²；最後，是沒有小序與書籍簡介，純粹列舉書目的形式，鄭樵《通志》〈藝文略〉，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及其他私家藏書的目錄，都是以這樣的形式出現。²³³而「目錄學」這一名稱則來自於清代考據學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後世對於目錄的研究，與劉向父子校勘圖書的目的類似，透過對書籍的整理，除了考察書籍的內容差異，同時也梳理該類知識的學科發展。²³⁴

在這樣的角度底下來觀察《中國史學史》，便是一部帶有「小序」與「圖書解題」的史學目錄。在金毓黻所介紹的「魏晉以來私家修史」、「唐宋以來官修史書與私修史書」、「近代史學發展」等篇章，每章首段的說明，代表這個時代史籍修纂的特色；對各類史籍劃分表格，依著作時序歸納，並對傳世史書說明大要。對於近代史學發展雖以人物、事件為主要介紹，金毓黻亦不脫這樣的書寫結構。為何會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史學史，或是校方在當時希望金毓黻任教史學史這一課程？如果從早期氏作《遼東文獻徵略》、〈遼海叢書總目提要〉、《東北文獻零拾》等作品，所依循著目錄學的方式來開展金毓黻的東北史地研究，反映出金毓黻慣用的學術方法，以及在他的史學思想中，「文獻」作為史學的基礎。

第五節 小結

不同於東北史地，在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方面，金毓黻可說是中途才加入學界的行列。在操作上較為陌生，不難理解。而學術研究本身的中立性與廣泛性，使得金毓黻的去中原中心史觀以及民族主義史學在此並無顯著的表現。然而，金毓黻只花了接近一年的時間，對於「中國史學史」這一學門就有如此完整的論述，筆者認為，這和金毓黻長期對文獻的蒐集與掌握有關。正如金毓黻在過往編纂東北史地的傳統史籍一樣，要介紹傳統史學發展，以史籍的學術成果為基礎可說相當適合。本書在時間軸的分割上，顯示出金

²³¹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 2-6。

²³²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 6-8。

²³³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 9-12。

²³⁴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5-9。

毓黻以現代史家之姿對於歷史的新觀點，而全書的建構又帶有傳統史著叢集編纂的性質。在此，新舊史法、史觀的交融，即金毓黻史學思想的「調和性」，又再次顯現於其史學史的研究當中。

結論 金毓黻史學思想之特色

總結金毓黻的生平與史學經驗，在金毓黻求學的階段，便先後經歷新式學堂的「新民教育」，以及民國初年北京大學的「考據學風」訓練；在 1920 年代金毓黻自北大畢業，回到東北從政、執教之時，又遇上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爭論；1931 年一個地緣上的背景，金毓黻還在滿洲國執政下協助日本人從事文化相關的工作，但金毓黻並沒有長期與日本政府合作的打算，反而選擇離開東北，加入在後方重建的國民政府與其學人，也是在此時，金毓黻出版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本文所分析的《東北通史》與《中國史學史》；而抗戰結束後，金毓黻重回北方，在國民政府執政的最後幾年與人民共和國執政的時期，先後進行了不少文物整理以及文獻編輯的工作。

在這樣的一個生平經驗的檢視下，可以看到金毓黻的生平經歷過不少「轉換」的階段，包含政權的轉換、學術概念的轉換……等，但筆者觀察金毓黻的史學思想與史學研究，在這一連串的「轉換」之中，有一些原則依循著。對於金毓黻的史學思想，筆者認為有兩項特色：「調和性」與「基礎性」。所謂「調和性」，是金毓黻在史學研究的過程中，對於新式史學方法與傳統史學觀點的結合，反映在其學術成果中「新舊交融」的面貌。而「基礎性」一說，在於金毓黻一生的史學研究，其實泰半以文獻的徵集為重，而對於史事的處理，也以「精確考訂」為主要工作，因此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學人，金毓黻所提出具有開創性的歷史見解相對稀少。

第一節 金毓黻史學思想的「調和性」

對於金毓黻「調和性」的史學思想，又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是史學方法方面。以金毓黻《東北通史》與《中國史學史》二書為中心，此二書的性質與金毓黻過往的地方史志編纂有其差異性，主要有三個面向。第一，是「通史」性質的書寫。這裡所謂的「通史」，指的是梁啟超在 1920 年代後所提倡的「普通歷史」書寫概念，希冀可以將歷史知識做更大的推廣。而兩書的成書基礎，皆為金毓黻的課堂講稿，顯示了兩書的成書，帶有傳遞「知識」的出發點。此外，兩書在中國史學與東北史地的開展上，取以相當長時間的論述，相對於金毓黻所言：「取古今史實之全部，而為概括之記述，以求其時間之

透嬾，空間之聯繫為原則者，是為之通史。」²³⁵可說服膺了金毓黻個人對通史的定義。

第二，時間軸的重新界定，加上現代史家的個人觀點。兩書對於中國史學發展與東北歷史進程，都進行了「分期」。所謂的「分期」，不只是兩書在時間軸的界定上，超越傳統朝代的時間切割，更在這一切割上，加上了研究者的「定義」。²³⁶這種對中國傳統歷史的重新切割以及分段，和傳統史籍的書寫有很大的差異。這一新式的時間定義，反映金毓黻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新認識。

第三，章節體的學術格式與論證性的歷史研究。不同於傳統史志以人物為主的分類方式，或是依據記錄事物分門別類，如山川、典志、禮樂……等，金毓黻二書的書寫以分章分節架構行文，而章節的主題，又以論證史事為主。在《東北通史》中，有金毓黻對於東北民族、地理交通……等考察；在《中國史學史》裡，則有對於史館成立、史官起源、史書類別……等論證。以「論證」為主的歷史書寫在中國傳統史籍中亦有類似的作品，但還是以敘述史事發展為主。而金毓黻二書以論證為主的歷史書寫，和其過往在地方志、文獻叢編的整理，有明顯的不同。由此看來，新式的寫作格式、重新以時代特色作為時空定義的歷史界定，以及作為現代「普通歷史」的書寫基礎，這些都反映出金毓黻史學方法中，屬於「現代」的面向。

而在學術成果的形式上有現代的結構，金毓黻在史學研究的方法中卻是依循著傳統考據的理路，以多重文獻的印證來檢視史事、史地的精確性。一如前文所述《東北通史》中，對於「漢代東北郡縣設立」的古今位置對照、「隋唐時期征伐高麗」的前後續述。

尤其金毓黻在 1940 年代所完成的東北史與史學史作品，可說是在近代中國史學界中，對於「通史」書寫的推廣，對於當時這一治史風氣，金毓黻對此有如下的論述：

…閱周谷城《中國通史》論東晉、南北朝一段，頗多獨到之見解

愚謂治本國史有二途：一曰鳥瞰式治史法；一曰蟲蛀式治史法。置身於史實之外，凌空俯視全局，歷歷在目，位置之遠近，形狀之大小，悉可一覽而得，此所謂鳥瞰式治史法也。置身於史實之中，一一從事展玩，而從而分析其內容，以尋其癥結所在，此所謂蟲

²³⁵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 356。

²³⁶ 如《東北通史》所界定的漢族開發期；「東胡」與「夫餘」二族相互競逐期；漢族重新開發期；靺鞨、契丹、女真、蒙古開發期；漢族、女真、蒙古族競逐期；到最後的東北各個族群融合期。以及《中國史學史》所分割的五階段：創造期、成立期、發展期、蛻變期，最後進入到今日的革新期。

蛙式治史法也。...²³⁷

其中「蟲蛙式治史法」又可稱之為「解剖式治史法」，金毓黻認為這樣的史學方法，「取若干史實一一為之分析，而明其得失去取」。鳥瞰式的宏觀與蟲蛙式的微觀，對於史事的觀察各有優點，不過金毓黻認為：「愚謂治通史應以鳥瞰式為主，而以蟲蛙式或解剖式輔之，庶乎其可，否則通於此則窒於彼，雖名通史，實史考之叢編耳。」²³⁸這一論述顯示金毓黻在現代史籍的編纂中，依舊保持著「考據治史」的態度。這些都顯示出金毓黻史學方法中，屬於「調和性」的一面。

第二是「史學觀點」的層面，一如本文首段，金毓黻的生平經歷過中國近代學界、社會發展上多次的「轉換」，而因著這些「轉換」，金毓黻的學術觀點也有所變化。最顯著者在金毓黻對於東北史地研究的過程中，首先是以「愛鄉」與「證史」為出發點來進行東北史地研究，因而以地方史志、鄉正遺著為主要的蒐羅、閱讀；九一八事變後，金毓黻在滿洲國以及四川重慶政府的學術環境下，對於東北史地又以「國史一環」稱之，展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史學情懷。因應著不同時期的學術氛圍，金毓黻對於東北史地的觀點也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進入到人民共和國時期，國家政策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主要的教育，金毓黻也在日記中多次記錄他的「學習心得」，甚至關注「以農民起義」為主題的歷史研究，和過往的史學觀點又發生「轉換」。

除了治史觀點的轉換，金毓黻治史的主題也隨著時代而有所變化。觀察金毓黻生平的重要著作，除長期經營的東北史地研究，以及延伸自東北史地研究的「遼金史研究」、「高麗研究」等，金毓黻的其他學術研究，如《中國史學史》、《太平天國史料彙編》、《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等著作，都非金毓黻長期經營的史學領域，而金毓黻的這些著作的產生，也反映其對於個人學術的專業，與時代學術氛圍的「調和」。

第二節 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基礎性

然而金毓黻對這些相對陌生的史學主題的處理，卻也有著不錯的成績，這和金毓黻史學思想的第二個特性：「基礎性」有關。關於金毓黻史學思想的基礎性，要回應其在

²³⁷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5014。

²³⁸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5014。

日記中對自己學術道路的期待，「史學」一直是他所希望專心致之的學問。就金毓黻最初在日記的定義，「史學」是一種廣義的「文史之學」，因此各類古籍都是史籍的一部分，這一種「綜合性」的歷史意識，也體現在金毓黻首先編輯的東北地方史志，以及日後編寫的《渤海國志長編》、《遼海叢書》等作品。而從最初地方史志的「綜合性歷史」，到新式史學的「專史書寫」，雖然型態有所差異，金毓黻始終堅持著史學的道路，也一直秉持一項原則。在金毓黻的史學研究中，「文獻」一直是他治史的主要核心，對於這樣的治史基礎，又可分為三個面向，「一曰眼勤，亦曰勤於誦覽；二曰手勤，亦曰勤於抄纂；三曰腳勤，亦曰勤於遊歷是也。」金毓黻在這一論證下更指出，如《史記》、《通鑑》、《徐霞客遊記》等史著，正是因為史家對於文獻的廣博徵引、整理，有了豐厚的史料基礎，才有今日吾人看到的成果。²³⁹

1949年1月，金毓黻在東北大學的講堂上再次說明了他對史學工作的認識，綜括來說為三項：「考辨過去事實；求取因果關係；推測未來演變」²⁴⁰，金毓黻對這三點的說明如下：

…大抵歷史記載過去之事實，可信之程度本屬有限，史家之職責即取此可信有限之事實，加以蒐討考辨，使之近於真確，以供同一時代或下一代史家之利用，此之謂實事求是。今日演變成之任何事實，無不有其前因，此繁不可理之前因，即存在於記載過去之歷史之中。吾人可因今日結成之後果，以推求何以結成此果之前因，此之謂即果求因。且夫今日所謂後果，亦為來日演成種種事實之前因，故又可即今日所謂後果，以預測來日之無窮演變，此之謂查往知來。…²⁴¹

「考據」的意識在這段談話中明顯的出現，而考辨歷史的目的除了釐清史事發展外，又提供了現實社會運作的參考點。

服務於人民共和國主政時期，金毓黻對於文獻史料的處理方式，又提出了四項觀點：

…綜編史料之法有四：一為長編體。以年、月、日為次，如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²³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4145-4146。

²⁴⁰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6754。

²⁴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6753。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是也。後來明、清二代《實錄》亦屬此體。再節刪之，可成為正史之中《本紀》。二為會要體。以典章制度分類，每類中仍以年、月、日為次，如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王溥之唐、五代兩《會要》，宋人所編之《宋會要》皆是也；明、清二代之《會典》亦屬此體，但只以職官為主，不如《會要》之概括一切。再節刪之可成為正史之《志》。三為紀傳體。以人為主，如宋人所編輯之《碑傳琬琰集》、清人所編之正續《碑傳集》等是也。再節刪之則成為正史之《列傳》。四為紀事本末體。以若干政治大事為題，如袁樞之《通鑑紀事本末》、清代官修之《平逆(定)三藩(逆)諸方略》是也。再節刪之，可成為正史中之《載記》。四者之外，尚有《表》之一體，則須從若干史料中綜理另製。...²⁴²

這段談話明顯的反映出金毓黻對於文獻掌握的程度，而這些對於文獻編輯的方法仍然是以傳統史著的範疇來歸納，甚至可以對應到「正史」的各個章節。可以看到對於基礎文獻的重視、以考據為主的史學方法，乃至於對舊史體清楚的掌握，在金毓黻的史學思想中，有相當強烈的「傳統」認識。

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到金毓黻史學思想所呈現的特色：在史學研究的呈現上，有著「現代史學」的容貌，而在金毓黻史學方法的操作與認知中，則有強烈的「傳統史學」色彩，而這一「新舊交融」的面貌，成為金毓黻史學思想的特色。這也顯示金毓黻在中國面對新文化與傳統的比較上，無所偏廢，但也不過度褒貶。這樣的調和性，使得金毓黻於 1936 年進入中央大學，面對南北交會的學人，挾帶學派上的針鋒相對時，有辦法從中協調、緩和氣氛。²⁴³

第三節 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關係

對於金毓黻而言，「新舊並存」的史學思想並非特例，綜括來說民初以降許多歷史學者的學術成果都帶有這樣的特色，甚至因為「新舊並存」的關係，更加推進了他們在日後史學研究的開展。但金毓黻相對於這些學者，卻不特出。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金毓黻的史學思想在新舊學術觀點與操作的調和之外，「基礎性」是其人更主要的

²⁴²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 7295。

²⁴³ 詳細的論述可參見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分合〉一文。

特色。除了本文所選二書之外，金毓黻的其他學術著作，以及其他地方史志、史料叢編等，乃至於到了 1949 年之後，金毓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服務時，依舊以編纂史料檔案為主要工作。²⁴⁴這些對資料整理、編排的工作，相較於其他同時代的學人，例如以 1930 年代發生的古史辨運動，胡適、顧頡剛等人所提出的各項對於古代史研究的新式觀點，金毓黻在這樣「破舊立新」的表現上，顯得較為薄弱。雖然 1940 年代後，其學術作品是新式史學的型態呈現，但是討論的重心還是以史事的精確性為主，金毓黻個人特殊的觀點較為稀少。

不過，金毓黻史學思想的調和性，也反映了在學術轉型時期，學人新舊文化取捨心態的調整，並非是楚河漢界的對立，在金毓黻學術工作的實際操作上，新學與舊法是可以相互共存的，不過孰為主，孰為客，又取決於學人對於新學舊法的認知，一如金毓黻在新學的框架下，以考據之法進行學術研究。而金毓黻雖然在學術成果上以基礎資料的編輯為主，卻也提供東北史、明清史、史學史等科目上，後世學人研究的便利性。相較於同時期的史學家，金毓黻並非一個「明星式」的學人，甚是沒有搭上學術討論的潮流，但他對日後歷史研究的「奠基性」，功不可沒。

在 1980 年代後，中國學界對於金毓黻的生平與學術展現了高度的關切，並且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不論是否為一種新的學術命題的開發，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帶有對於過往強調唯物史觀的治學方法，間接的反思。然筆者以為，金毓黻固然對 1940 年代以降的中國史學界，提供了相當便利的研究基礎，然溢美之詞加諸金毓黻，不免有失真之感，如何更公允而真實的呈現金毓黻在史學界的面貌，是今後對於「金毓黻研究」可以努力的一個面向。此外，相對於台灣學界對金毓黻的陌生，若以台灣方面的角度對於金毓黻進行研究，筆者認為除了過去熟悉的《中國史學史》一書與東北民族史的基礎材料外，金毓黻對於地方史志編寫的心得與建議，和台灣文史工作者近年在各個地方「方志」編寫的工作開展上，有他山之石的象徵，足以借鏡。

²⁴⁴ 相關書籍如前文所述：《遼海書徵》、《東北文獻零拾》、《東北古印鈎沉》，以及 1949 年後金毓黻所編纂的《太平天國史料》、《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中國地震年表》等。

徵引與參考書目

史料

金毓黻著，《靜晤室日記》。遼寧，遼瀋書社，1993

專書

- 《金毓黻學術年譜》(初稿)，長春：學術研究叢刊編輯部，1987。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2004。
金毓黻，《東北通史》，台北：樂天出版：1971。
康樂《從西郊道南郊》，台北：稻香出版，1995。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張豈之主編，《民國學案》，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曹殿舉主編，《吉林方志大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
傅斯年，《東北通史》，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32。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2002。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1995。
黃克武，《惟適之安》，台北：聯經出版，2010。

期刊論文與專文

- 王夏剛，〈論抗戰時期的中國東北史研究〉，《大連大學學報》，26：5(遼寧，2005)，頁 91-95。
王國成，〈唐代渤海國姓氏研究〉，《北方論叢》，4，(哈爾濱，2005)，頁 96-100。
王鼎，〈瀋陽才子 史壇名家—金毓黻生平事略〉，《圖書館學刊》，5，(瀋陽，1987)，頁 20-24。
王慶丰，〈金毓黻與《遼海叢書》〉，《社會科學輯刊》，1，(瀋陽，1986)，頁 70-74。
甘孺，〈遼海叢書〉，《史學集刊》，2，(吉林，1982)，頁 71。
百瀨弘著 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禹貢》，6：3、4(北京，1936)，頁 111-118。
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遼寧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6 期，頁 79-82。
邢玉林，〈東北史學巨擘金毓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 2 期，頁 96-99

- 初國卿，〈金毓黻與繆潤紱〉，《文化學刊》，4，(瀋陽，2012)，頁 173-176。
- 初國卿，〈遼海兩大師的學術情誼---紀念金毓黻逝世 50 週年李文信逝世 30 週年〉，《芒種》，192，(遼寧，2012)，頁 38-41
-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重讀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煙台師範學院學報》，3，(煙台，2003)，頁 47-51。
- 周文玖，〈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的學術系譜〉，《回族研究》，2(寧夏，2005)，頁 98-103。
- 定宜庄，〈《東北通史》評介〉，《史學史研究》，2，(北京，1983)，頁 22-23。
- 武麗璋，〈傅斯年《東北史綱》與金毓黻《東北通史》之比較〉，《長治學院學報》，28：4，(長治，2011)，頁 77-80
- 金恩輝，〈學者的品德、友誼和骨氣---兼談王重民先生和金毓黻先生君子之交〉，《圖書館學刊》，1，(瀋陽，1999)，頁 61-63。
- 金景芳，〈金毓黻傳略〉，《史學史研究》，3，(北京，1986)，頁 71-74。
- 姚玉成，〈“渤海俗所貴者”“太白之菟”考辯〉，《史學集刊》，2，(長春，2008)，頁 75-80
- 范壽琨，〈披沙揀金 銖積寸累---記勤奮治學的金毓黻先生〉，《學術研究叢刊》，4，(長春，1987)，頁 21-27
- 范壽琨，〈記金毓黻先生的治學道路初探〉，《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1987)，頁 212-218
- 范壽琨，〈金毓黻先生學術思想研究概述〉，《北方文物》，3，(黑龍江，1997)，頁 90-93。
- 桑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5，(北京，2004)，頁 116-139。
- 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近代史研究》，5，(北京，2008)，頁 22-36。
- 崔燦 杜尚俠，〈史壇巨匠金毓黻〉，收自崔燦 杜尚俠著，《遼海文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頁 256-258。
- 張凱，〈改造舊史編纂新史：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之學術旨趣〉，《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開封，2012)，頁 81-87。
- 張鈞，〈《渤海國志長編》(上冊)標點校勘〉，《牡丹江師範學報》，1991 年第 3 期，頁 51-55
- 梁啓政 王峰，〈金毓黻執教中央大學與東北大學經過〉，《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8：5，(吉林，2007)，頁 23-25。
- 梁啓政，〈金毓黻三次域外訪書述評〉，《社會科學戰線》，5，(長春，2008)，頁 104-106。
- 梁啓政，〈金毓黻之渤海上京研究與東京城訪古〉，《北方文物》，9，(哈爾濱，2008)，頁 37-42。
- 梁啓政，〈金毓黻藏書印初考〉，《北方文物》，3，(哈爾濱，2009)，頁 89-94。
- 梁啓政，〈金曉屯與金靜庵先生交誼述略〉，《通化師範學院學報》，11，(吉林，

- 2007), 頁 62-85。
- 梁啓政,〈略論東北史學家金毓黻之藏書〉,《蘭台世界》, 29, (遼寧, 2009), 頁 37-42。
- 郭君,〈東北文獻學家金毓黻〉,《文獻》, 1, (北京, 1987), 頁 126-138。
- 郭君,〈金毓黻生平及著作簡介〉,《圖書館學研究》, 4, (長春, 1985), 頁 86-87。
- 陳其泰,〈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成果——讀劉節先生《中國史學史稿》〉,《史學史研究》, 6, (北京, 1983), 頁 33-36。
- 陳澧,〈《奉天通志》述略〉,《瀋陽師範學院學報》, 1, (瀋陽, 1982), 頁 68-73。
- 陳陶然,〈金毓黻史料方法論析〉,《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0: 6, (吉林, 2009), 頁 80-82。
- 傅振倫,〈金靜庵先生行誼〉,《黑龍江史志》, 4, (黑龍江, 1984), 頁 51-55。
- 楊仁凱,〈史壇巨匠 遺範流芳——記金毓黻先生治學與任事之道〉,《遼陽文物學刊》, 2, (遼寧, 1987), 頁 36-39。
- 葛兆光,〈談史學史的編纂——兼評朱杰勤著《中國古代史學史》〉,《史學史研究》, 6, (北京, 1983), 頁 65-80。
- 榮文庫,〈試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 5, (瀋陽, 1994), 頁 49-54。
- 熊尚厚,〈金毓黻〉,收自張舜徽編著《中國史家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4), 頁 333-337。
- 趙紅梅,〈渦沮族稱謂探析〉,《黑龍江民族叢刊》, 2, (哈爾濱, 2006), 頁 82-84
- 趙愛明,〈《奉天通志》人物部分訛誤簡析〉,《圖書館學刊》, 2, (瀋陽, 1991 年), 頁 53-55。
- 趙慶雲,〈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界》, 2, (合肥, 2008), 頁 227-236。
- 蔣正虎,《論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影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05。
- 鄭善慶,〈20 世紀史家與《二十六史》的整理〉,《滄桑》, 4, (太原, 2010), 頁 125-128。
- 鄭善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定名初考〉,《史學史研究》, 1, (北京, 2010), 頁 121-123。
- 鄭雲波 姜華昌〈金毓黻是愛國主義史學家〉,《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5, (黑龍江, 2001), 頁 46-50。
- 曉辰,〈也談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北方文物》, 3, (哈爾濱, 2003), 頁 80-81
- 盧偉,〈渤海國湖洲志所及湄沱湖問題〉,《北方文物》, 4, (哈爾濱, 2006), 頁 37-40
- 霍明琨 曲強〈大陸近三十年金毓黻研究綜述〉,《黑河學院學報》, 4, (黑河, 2010), 頁 95-99。
- 霍明琨〈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早年治學轉折探悉〉,《黑龍江社會科學》, 6, (哈爾濱, 2009), 頁 94-96。

瞿林東，〈史學怎樣尋找自己——重讀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1998)，頁 185-190。

羅繼祖，〈金毓黻先生與《遼海叢書》〉，收自羅繼祖著《魯詩堂談往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312-316。

羅繼祖，〈編輯東北史叢書資料爭議〉，《史學集刊》，12，(長春，1982)，頁 39-41

顧奎相〈承先啓後 繼往開來——遼寧史學百年回顧〉，《社會科學輯刊》，4，(瀋陽，2001)，頁 122-127。